

目 录

春秋笔

- 1 齐燕铭在文化部……………齐翔延 周士元
9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陈大斌

往事录

- 14 谭甫仁017凶案……………周孜仁
21 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王生甫 杜佩玲
27 我在华懋饭店当西崽……………杨孟亮

沉思录

- 31 中国教育值得深思的问题……………钟沛璋
36 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高秦伟

人物志

- 38 从陕北革命根据地走来的郭洪涛……………文安生
45 百岁学者谈启蒙……………李维民
——访夏征农同志

怀人篇

- 47 白桦关注右派分子……………于俊沂
50 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朱太刚

品书斋

- 51 执着的探索……………汪子嵩
——读薛德震《人的哲学论说》
55 党史的写法……………韩 钢
——读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

一家言

- 57 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李 锐
——《中国水力发电史》序言
61 小平同志的三点高见……………杨正彦

文荟苑

- 63 梅兰芳天津滞留记……………张颂甲

古今谈

- 68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袁伟时

两岸情

- 72 台湾学界奇才吕士朋……………马社香

古镜台

- 76 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潘旭澜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镗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4.80元

齐燕铭在文化部

● 齐翔延 周士元

被周恩来派进文化部

1958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派齐燕铭到文化部帮助工作。最初总理不同意,后来答应让齐燕铭兼一部分文化部的的工作,只管文博、出版和戏曲,主要精力仍放在国务院。

196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齐燕铭为文化部党组成员,2月16日,周总理任命齐燕铭兼任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3月,钱俊瑞调离后,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由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社会活动较多,齐燕铭实际上主持文化部的工作。

60年代初期,全国文化界的形势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

建国十一年来,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在电影、戏曲、音乐、舞蹈、小说、诗歌、美术等方面,在艺术水平上、品种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特别是电影、话剧(包括歌剧),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戏曲创作逐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展现出新的舞台形象。

然而,文化艺术界每迈出一步,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变幻无常的政治运动始终是笼罩在文艺界头顶上的一块阴云。

解放初期,当广大电影工作者正积极投身于新中国事业的时候,1951年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致使电影事业停顿了两年时间。随后开展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影响,文艺战线一片萧

条,各地各个剧种的传统剧目、地方戏保留剧目一概被禁止演出,以至于许多剧团无戏可演,生活不保,引发了艺人们的极大不满。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欢欣鼓舞,一时涌现出一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化部也于1957年4月宣布开放一批“禁戏”。有人称颂“文艺界的春天到来了”。但时隔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大批文艺界人士被打成“右派”。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文化部把“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并采取按百分比的方式(即现代戏、传统戏各占多少)给各级剧团下达指令性的任务,形而上学的行政措施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一时间“假、大、空”的胡编乱造的“艺术”作品充斥舞台,不但现代戏没有促上去,连好的传统戏剧也给拉了下来。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宣部召开的文化工作会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认识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提出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涉及19世纪欧洲文学。

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担忧,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理想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齐燕铭被周总理派进了文化部。

对文物古籍事业的贡献

齐燕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介入文化部工作。在兼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第一年,他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务院,在文化部,开始只管古籍、出版、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为今后推开文化部的做一些调查研究,组织召开座谈会,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

齐燕铭一直把保护和拯救中华文化遗产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在文化部的岗位上,他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事情纳入了正常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轨道。例如,蜚声于海内外的北京荣宝斋,齐燕铭就曾经给予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荣宝斋是享誉中外的一家中国传统的古玩字画店,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艺术大师,都曾在这里的座上客。就连鲁迅、郑振铎也都常常光顾荣宝斋。然而到了解放前夕,荣宝斋到了几乎要关门的地步。在郑振铎、胡愈之、齐燕铭等人的帮助下,国家出版总署投入一部分资金,实行公私合营,使荣宝斋免除了这一劫难。

齐燕铭以其远见卓识支持临摹复制古代书画名品,成为北京琉璃厂的一段佳话。50年代后期,经理侯恺为推动荣宝斋的经营,启聘了一批行家里手,从故宫和东北博物馆临摹了百件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诸如唐周的《簪花仕女图》、晚唐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这样既能更好地宣扬祖国绘画艺术瑰宝,同时也有利于荣宝斋的经营,并且可以为国家换取大量的外汇。

齐燕铭仔细地看了足以乱真的《韩熙载夜宴图》后,高兴地说:“不要急于卖出,因为只有三十多件,数量少,画又名贵,国内国外各大博物馆都可作为一件副本收展。虽非原作,但可欣赏到中国历代传统绘画的基本面貌,还可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宣传一下,我可给你们介绍在国外报刊杂志上登载。价格可定高一点,国内外要有区别。”果不出其所料,这些复制品以五万元为起点出售,销路极好,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纷纷前来购买。

齐燕铭认为,荣宝斋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力,帮助国家回收古代著名书画作品。在得知

荣宝斋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后,齐燕铭特批了十数万元专项拨款,作为回收资金使用。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奔走于民间,搜集回来大批字画。每批珍贵资料搜集到之后,齐燕铭都亲自组织专家审查。他指示凡收到的一级品,一定要提供给国家收藏。而故宫有些不必收藏的,或数量过多的,再由荣宝斋出售,称之为“前门进,后门出”。

齐燕铭到文化部工作后,把字画销售问题列入文化工作议程,1960年4月3日,齐燕铭把商业部、外贸部、土产出口公司、特种工艺品公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文化部,对改变文物商业管理体制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30日,发出了《关于新华书店经销荣宝斋木刻水印画的通知》。1961年12月,又召集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将不宜在国内出售的清末民国初期的名人字画组织出口和将荣宝斋、文物出版社的复制品运往香港出售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于弘扬祖国文化,增加荣宝斋的资金积累,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是1952年由郑振铎、齐燕铭提议,政府批准成立的,郭沫若题写了招牌。在以后的岁月里,齐燕铭给予了大量的关心和支持,中国书店开始以经营古旧书刊为主,兼做文房四宝、工艺品等,如今已成为北京以至中国的古旧书业的“龙头老大”。齐燕铭稍有闲暇,就要去和中国书店经理和专家们聊一聊古籍文物的发掘、抢救问题,指出不要轻视古旧书经营行当,这项工作做好了,同样造福社会、功在千秋。自1952年11月4日成立以后的50年里,中国书店抢救的各种珍贵古籍文献中,未见著录的罕见的孤本、珍善本古籍5000余部,被完好地进入国家级图书馆永世收藏;修补珍贵古籍20余万册;补配重要典籍近万部;整理、出版古籍图书2035种。如今,设在琉璃厂的总店以及同一条街的子店邃雅斋、汲古阁等,都是学人们“淘金”的好去处。

齐燕铭亲自领导的古籍整理、点校、出版工作,更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2月10日,在齐燕铭的倡议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亲任组长,以抢救、整理、点校、注疏、编辑、出版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典籍。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人员都是中国当代学问大家。文学组召集人是郑振铎、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是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是潘梓年、冯友兰。规定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从浩瀚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选用对象,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很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难的。

1960年,齐燕铭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领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这些读物和工具、参考书,为广大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是古籍整理中一项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问题,许多民主人士、学者也都引颈企盼。在齐燕铭的具体领导下,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整理,在校勘、标点、分段后出版发行。1959年,前四史首先出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同时也为其余诸史的点校工作铺垫了深厚的基础。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如今,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已成为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新元史》、《清史稿》也得以校勘出版,人们遂称之为二十六史。

中华书局是中国古籍出版业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当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非常艰难,128名业务、行政人员挤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大批珍贵古籍史料堆积在走廊楼道,整个院子拥挤如蜂巢蚁穴,冬季煤气呛人,夏季恶臭刺鼻。金灿然一次次找文化部有关部门交涉,数年没有结果。齐燕铭为此极为愤怒。到文化部以后,他亲自多方奔走,终于使中华书局在1961年秋季搬到了翠微路的文化学

院的旧址,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他还帮助物色人才,陆续推荐了一批学者,加强了中华书局的编校力量。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标点二十四史老专家的身体康,他又帮助解决副食品供应等问题。

齐燕铭在出版学术著作问题上,极力主张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摒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和政治上的偏见,支持出版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在齐燕铭的指导下,组织专人整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等人的著作,其后,冯友兰、马叙伦、杨树达、余嘉锡、陈垣、汤用彤、岑仲勉、罗常培、王力等各不同门户学者的著作也都相继问世。那时国家困难,印刷纸张十分低劣,但是,他们的作品得以出版已属不易,还是非常高兴的。

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古籍整理事业,始终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在他和金灿然、吴晗、翦伯赞、魏建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合办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后来还招收研究生。中华书局也选送青年编辑去深造。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同志也都在这个专业



齐燕铭 1930年摄于北京



“文革”中齐燕铭遭到残酷批斗

讲过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不可多得的古籍整理人才。

齐燕铭在进行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时,并没有忽略正常的出版发行工作。仅在1960年和1961年的时间里,他就召开各种会议十余次,围绕科技图书、学生课本、毛泽东著作、文学作品、画册年画等开展座谈,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天灾人祸,纸张等印刷物资供应极其困难,他又专门组织召开文化物资方面的会议,协调、解决出版方面的困难,并强调无论如何,要确保学生课本应用纸张。他针对编辑印刷环节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要求健全编辑审校制度,堵塞差错漏洞,提高编辑、印刷质量,并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报送了《关于提高书籍质量,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些措施,为我国的出版事业走上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文物工作和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此前文化部尽管对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工作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混

乱状态,以至于陈毅副总理曾为此发过脾气。

1960年3月15日至25日,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十年来的工作成绩、讨论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八年远景规划和1960年工作计划。

齐燕铭在会上作了《关于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提高工作质量》的报告,他说,从1949年建国至1957年,全国博物馆已增至72个,为1949年的342%;发掘古文化遗址316处,古墓葬23102座,出土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各时代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表明新中国对文博工作的重视。报告强调今后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全面规划,注重提高质量,并迅速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随后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两个重要文件。

1960年11月,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齐燕铭说明了制定这两个文件的原因:(一)过去陆续发的几个有关文件,有些已不适用或重复,有的需要统一起来,集中成一个文件。(二)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配合农业生产建设高潮保护历史、革命文物的指示》后,各省市自治区作了文物普查工作,到1959年10月,各地已公布8663个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为了便于同规划、基建部门配合,以利将来的文物发掘规划、保护、移动,提出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对文物的范围、管理机构、文物等级、保护、发掘等作了20条规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76处。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于1961年4月1日公布。

这些法规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齐燕铭在主持文化部工作的时间内,为剧团的改制、为群众文化工作、为改善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和管理

条例。同时,完成国务院要求文化部机关及文艺团体精简机构和下放人员的任务,落实甄别平反政策,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安置生活、安排工作。

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在文化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他的艰难的文化之旅,仅是一个起步。

提出“三者并举”的口号

戏曲事业一直是文化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戏曲,齐燕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在延安时期,他和杨绍萱共同创作了《逼上梁山》,并亲自导演,演出后反响强烈,毛泽东当晚就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道:“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9年初,齐燕铭护送一批民主人士从石家庄去北京,在李家庄停留的时候,中央统战部举行晚会,齐燕铭应大家的邀请,清唱了一段昆曲《林冲夜奔》,字正腔圆,余音绕梁,使得许多人大吃一惊,楚图南在他回忆录中感慨地说:“我这才了解到燕铭同志的多才多艺,既有深湛的文化艺术修养,又有燕赵之士的豪情,更有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身边团结了大批全国东西南北各剧种、各流派的表演艺术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有这些,都是齐燕铭能够当好文化部领导的重要条件。

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批批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因为“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处分。许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战战兢兢,生怕逾越“雷池”一步。即使在这样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还是出现了一批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歌剧《红霞》(1957)、《洪湖赤卫队》(1959)、《柯山红日》(1959)、《红珊瑚》(1960)、《刘三姐》(1960)等轰动一时,妇孺皆知。话剧舞台也涌现出《枯木逢春》、《槐树庄》、《龙江颂》、《洞箫横吹》、《万水千山》、《兵临城下》、《创业史》、《星火燎原》等,还有反映历史题材的《蔡文姬》、《胆剑篇》、《关汉卿》、《文成公

主》等等。而传统戏曲舞台则相形之下显得不足。196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传统戏的剧目占的比例很大,少量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质量粗糙。

齐燕铭十分清楚,戏曲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渊源的关系,又有现实的问题。首先传统戏曲在表演程式上的局限性,对于表现现代人物,尤其表现工农兵,就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其次,落后的剧本创作也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主要症结。第三,在音乐、舞美、化妆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脸谱化的模式,成为传统戏曲改革的不易逾越的障碍。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文艺战线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许多人不分良莠,把传统剧目统统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否定,而现代戏的创作和表演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摸索阶段,数量少,质量差,其中许多还受到批判。省、市、县的剧团因无戏演而生存困难,老百姓因无戏看而有意见。

新中国文艺界“左”祸的发端,应当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电影最初根据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山东贫民武训乞讨筹资兴办义学,让穷人子弟得以识字读书的事迹,组织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训传》。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因资金不足而停顿。解放后,孙瑜得到国家贷款,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很快完成了拍摄任务。电影放映后,在北京、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在江青的蛊惑下,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以及关于它的赞扬文章发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又在江青的参与下,中宣部专门组织人马到武训的家乡“调查研究”,进行穷追猛打。在这次批判中,周恩来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政治批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电影界、戏剧界的作家不敢写、导演不敢导、演员不敢演,“停演”、“禁演”传统戏之风也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文化事业的发展极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在看了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针对戏剧界存在的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

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一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随后在5月17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更为详尽地谈到了地方戏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題、传统剧目的改编问題、戏剧的民族风格和优良传统问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问題。明确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在谈到古装戏的积极思想意义时，他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官’的有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作‘官’的人，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个剧目（《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也挽救了传统戏剧。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周恩来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战线的“左”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959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是周恩来于1959年5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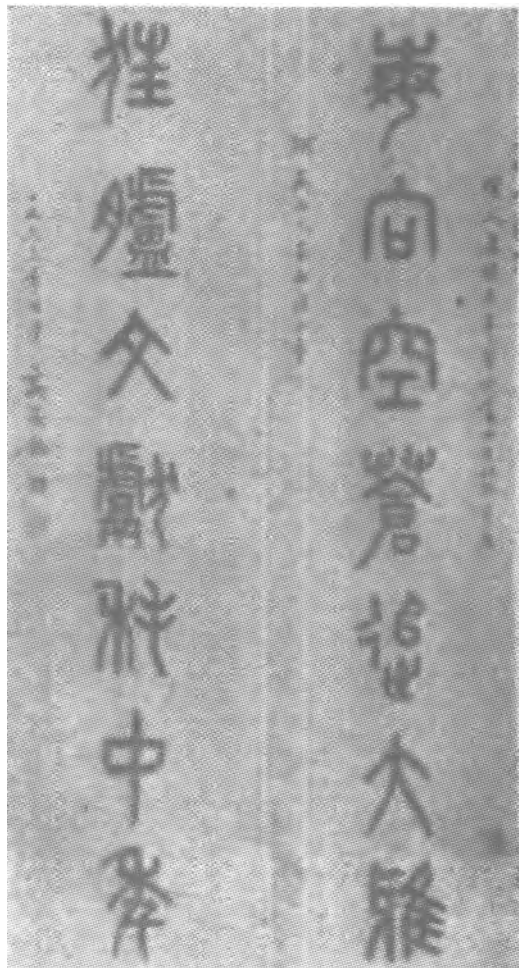
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代表、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就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的关系，戏曲的形式与风格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年之间的两次讲话，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出周恩来对于戏剧文化艺术的真知灼见。对于这两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当时的文化部党组都没有认真传达、贯彻，理由是怕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上海的柯庆施只批准在20个人范围内传达。对这种做法，周恩来总理不能不有所感觉。他曾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说道：1959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在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文化战线上的指导思想贯彻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齐燕铭派往文化部，希望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拓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齐燕铭不负总理厚望，到文化部后，认真学习总理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和整顿、改革的工作。

1960年的全国戏剧观



齐燕铭书法

摩大会结束后，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各地的作家不怕“戴帽子”、不怕“打棍子”，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反映出当时现代戏剧的创作为什么数量少、质量差的普遍原因，把矛头直指“左”的思潮。

广东省的郑达在发言时说，广东的粤剧、潮剧、琼剧，传统破坏较大，受外界影响多。1958年大跃进中还在整风。尽管广东省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时成绩大，粤剧演出了现代戏《刘胡兰》、《黄花岗》，历史戏《荆轲》等，琼剧有《红色娘子军》等。但是，剧本创作还是有几个难题：1、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能否当主角？2、历史剧如何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失败？3、如何记载历史真实？如何抛开史料写历史剧？如何确定史料的限制？4、如何表现落后人物的转变？如何写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可否成为悲剧？

武汉人艺的吴乙天在发言中说，如何贯彻“二百”方针？1958年-1959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以政治代替艺术是根本的问题。简单化的领导是普遍现象。头天交任务，次日要交卷，大戏三五天。不许对现代戏提意见。现代戏有政治性。他们（指领导）的方法，一是根据报纸的消息，二是小人书。除毒草做得好，但是识别毒草、香花有问题。专业编剧人员太少，他们都是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对创作顾虑重重。一致怕写、不写现代戏，或仅只根据别人作品改编。写矛盾、写正面人物和领导人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到生活中采访，容易写真人真事，没有冲突，没有对立面。造成作家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人为地制造矛盾。

作家黄佐临在讨论会上说写作有十一怕：1、怕犯错误、怕“戴帽子”；2、怕写矛盾（现代剧）、对立面；3、不敢写对比；4、正面人物不敢夸；5、不敢将反面人物写得太深刻；6、怕出题目做文；7、怕同首长争论；8、群众的意见不敢争论；9、怕割



齐燕铭和夫人冯慧德（1974年摄）

爱；10、怕集体创作合不来；11、怕重大题材。小组会上还说，上级的意见，下去就变为命令。创作单位不能自定计划，要跟着运动跑。《上海文学》发表《钢人铁岛》剧本，被停刊一个月。

安徽的作家说，怕写现代戏有三个原因：1、作者本身有情绪；2、生活少，写不出；3、批得厉害，“左”得过火。

福建的作家说，现代题材戏质量低，是因为作家不敢写。

齐燕铭听了这些意见，大为感动，陷入深思。

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他看到了在广大作家、艺术家身上蕴藏着极大的艺术创造热情，认为只要善于因势利导，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保护他们，中国的戏曲事业才会有希望。一场场的观摩，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的交流意见，常常使齐燕铭彻夜难眠。他必须寻求出一条这样的道路：既要上面满意，同意放行，同时又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接受、能够实行；既要考虑到传统剧是不可遗弃的文化遗产，又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戏也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

他根据周恩来多年来对于戏剧事业的一贯主张，联系自己对于戏剧艺术的认识，在1960年

4月29日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三者并举”的口号。

他说:“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在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为“禁戏”和“开禁”问题困扰,一直把传统戏和现代戏视作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齐燕铭把这三者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整体,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诠释了党的“双百”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大跃进”期间提倡的“以现代戏为纲”的极端观念的纠偏。

“三者并举”的思路立即得到中宣部的认可和支持。在5月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三者并举”问题讲了话。他说:“以前提出改戏、改制、改人,以后要进入新的阶段,不断革命、革新、提高。1958年表现现代生活成为潮流,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不但能演传统剧目、历史题材,而且能演现代题材。……扶持现代剧目,不要排斥传统剧目。不能以要求传统剧目的艺术标准要求现代剧,因传统剧目是长期的创造、积累,内容形式协调。现代戏存在矛盾。另外也不要鼓励现代戏粗制滥造,临时任务是另一回事。”

5月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齐燕铭的《现代题材戏曲的大跃进》文章,在充分肯定现代题材戏曲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辩证的分析了历史剧、传统戏的发展状况。他写道:“过去也有人写历史剧,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空城计》、《包公案》、《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今天也可以替曹操翻案,对历史剧不要随随便便抛弃。”传统戏曲剧目“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不少剧目反映着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意志,表现着人民的智慧和勇敢,因之也一直流传下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有一些老艺人懂的传统剧目很多,本身又有精美的表演技能,我认为他们可以完全不再去演现代剧目,而应该集中精力,有领导地去进行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工作,专门负责演出经过改编整理的传统剧目。这是合理分工。”

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戏剧必须

不断革命》的社论。

齐燕铭决定从抓建立和保护剧本创作队伍、推动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入手,推动戏曲方面的改革。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多次召开戏曲创作座谈会。其中1960年11月21日至26日天津召开的北方四省(河北、陕西、辽宁、河南)重点戏曲剧院的创作汇报会;1961年1月20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上海、广东、四川、武汉四省、市重点剧院、团创作汇报会等。在这些会议上,他充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齐燕铭曾先后与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戏曲界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个侧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探讨文化工作中的问题,寻求改进的办法。

1962年6月3日,在中国文联的工作会议上,齐燕铭说,为积极推动创作、繁荣创作,文化行政部门与剧协加强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举办学习会、戏曲讲习会,每次讨论十个剧本。举行三个座谈会:话剧农业题材座谈会、戏曲现代题材座谈会、革命历史题材座谈会。他说,现代戏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党的文艺政策与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安排好关心作家的福利工作(解决好旅费、观摩、听报告、参考材料、开会、兼职多、夜餐粮、健康等问题),要认真贯彻“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各地、各文化单位积极推荐好的剧本,发现人才,学习广东经验,奖励好的作品。同时进一步做好观摩演出、加强出版力量、办好两个刊物以及建立戏剧资源馆等方面工作。

随着这些工作计划的落实、实施,现代戏的创作、生产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轨道。

“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三者并举”口号的提出,对于戏曲的创作、生产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62年文艺界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文化部着力组织现代戏的创作、演出,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责任编辑 萧 徐)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 陈大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当形势稍有好转，中央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的资本主义做法，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也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2002年春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来到安庆拜访已经退休的钱让能，历经磨难而今年逾古稀的钱老，身体尚健，精神矍铄。相对而坐，面前清茶一杯，我们谈起了40年前的往事。

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

钱让能是一位有着良好文化、理论修养，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

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钱老说，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

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钱老继续说，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钱老说，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

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钱老说，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毛主席完全有采纳的可能。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钱老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

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错成败，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国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毛主席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

第二，毛主席对人民一贯情深意笃。他热爱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广大农民，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党性的共产党员，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园国土，忠诚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士大夫尚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一定要如实禀报。当时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实情况，肯定会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责任田”也许有保住希望。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粮食空前紧张，城乡人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食足有余。那么这种办法可以使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待以后去解决。我想，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问题，主席也会完全赞同的。更何况1961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面请示过主席同意的。

基于上述想法，五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小电厂一到晚上11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电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我问钱老，当时有没有感到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风险？钱老说，怎么会没有？在写成初稿后审校文字和推敲内容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次“犯颜直谏”，面临极大的风险。“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对公社体制提出问题。所以，几天之内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脑子时时浮现出来的农村那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声在耳边回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哲言使我不再犹豫。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也绝不能后退。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古往今来，“没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国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上级派人来和我谈话，让我作检讨，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已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

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从公文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给我,要我认真阅读,然后再和他谈感受。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从组织上服从,但认识上予以保留。”他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毛主席批示的,属于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同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他们在调查之前就有了结论。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的省委调查组1962年10月15日写出的那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写出《调查报告》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之后,又促使广大干部转“思想弯子”,召开更大规模的干部大会,批判“责任田”。

由于我在“上书”《保荐书》时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的面前,我个人倒显得很平静。省委调查组负责人再次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你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果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

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时任太湖县监委书记的李俊谈心。从50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工作,彼此了解。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更深的伤害,他经深思以后对我说:“庐山会议彭老总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个交待,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

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上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报告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省委作出示范,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这里,钱老感慨满怀。他说,在高压的氛围中,我不得不向我的妻子道出真情,并安排了我可能遭遇到不幸的后事。她既为自己丈夫的义举而自豪,同时又为不能为我解忧而痛心。

当时,钱老政治上陷入困境,幸好太湖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了解他关心他,安庆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暗中保护他,又给予工作,让他下乡调查研究。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风风雨雨,他安全的渡过了难关。1964年春,太湖县转发地委通知,调他离开太湖去省里等待另行分配。

钱老说,这出乎我的预料,省委调我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据说是省委书记李葆华点的名。

钱老说，我在省委政研室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初，我被调出政研室，回到安庆安排到地区农研所任所长。当时的政治气氛已趋紧张，我这种人这时只能搞科研，不能搞政研了。而“文革”一起，想搞科研也不可能了。

1966年夏秋间，我正与一班科技人员在徐河公社的稻田里日夜奋战，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这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当年我们一起辞别校门投身革命，她一直不辞劳苦的支持我做好本职工作，而今我却因言惹祸，而且祸及她和孩子，真让我五内俱焚，总觉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吐。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地和她上说几句话：“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说：“我相信你”。离别了妻子，我随着押解人员到了隔离地受审。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要向提着大红棍子的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批斗与劳动改造交替进行。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都由专政队押送到堤上干活。分给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一车土大约有六七百斤重量，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拉起，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地后，还要“请罪”，并接受专政队的批斗，随时被拳打脚踢。

随着“文革”的发展，批斗高潮迭起，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心想：活着受辱，倒不如到另一个冥冥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但忽而又想：回首平生无憾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决不能也无权利随便毁灭自己。坚信是非曲直忠邪，自有千秋公断。于是我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活下去！

安徽省、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肃清“三自一包”的流毒，搞大批判为其开路，把我当作活靶子。地区革委会成立了一个“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让能战斗队”，用了十

多天时间，精心编排批判“保荐书”的材料，并进行了预演。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些人在干什么事，有天夜里，突然听到战斗队传来狂热地喊叫，其中有号啕大哭的，有狂笑的，有怒吼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慷慨陈词的，也有抑扬顿挫像是在朗诵，就像一台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批《保荐书》而进行的预演。

正式彩排那天，我被拉到会场，战斗队员鱼贯而入，一个一个地照本宣科地批判我。其中有好东西都是“莫须有”的，我无申辩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听他们讲。批斗一节，就追问我一节。我则从容不迫地一节一节予以驳斥，有根有据，常常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头头们只好与战斗队一起大呼口号。

1969年元月，安徽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为了给会议增添光彩，体现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革委会又把我“请”到合肥。为了显示批判的“高水平”，会上又专门针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除在大会场批斗之外，每天还要到合肥市中心将我作为最典型的活靶子进行批斗，一直批到月底。之后又将我送回安庆，游斗于大别山区和沿江两岸城乡。

钱老说，整个“文革”前期，我作为靶子，在全省到处“游斗”。真是几度寒暑，几度春秋，都在批斗中度过。后来，也许是老调重弹没有人爱听，年年如此的一本旧戏，大家都感到了厌烦；也许是某些领导和头头们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了“解放”。此后，连续三年将我安排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直到1982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文，为我平反。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钱老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过去，宝贵的青春年华也在历史误会中耗尽。但是，我无怨无悔。历史发展证实：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必将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补偿。经常想到这，心底也就自然宽容和坦荡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责任编辑 萧 徐）

谭甫仁 017 凶案

● 周孜仁

如日中天的谭甫仁遭暗杀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介绍逝者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是要说明：按照当年“划线”方式——谭甫仁当属林彪的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至于1968年8月，待全国各省“新生红色政权”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的革委会也已待建就绪，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曰“划线站队”，即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之；板斧二曰“围海造田”，即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并以粮为纲之；板斧三曰“修‘万岁馆’”，即将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或炸或撤，一夜之内夷为平地，以速速敬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云。板斧利落既下，短短时间，“谭政委”在云南之威

望便日盛一日，蒸蒸日上。下面小举一例。

1970年11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因该届大会代表人数逾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我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我告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激动万分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呼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抱憾强忍了——我当然明白他想喊什么，对于山民的朴拙憨实只能报之一笑而已。

谭威望之如日中天，仅此一斑，可略窥全豹了。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万人大会闭幕后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杀。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2月17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20世纪70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1936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性质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全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

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发炮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从舷梯款款而下,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杀掉了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许并非无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我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名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料理地方工作,为此,甫汉受命组建了一专门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在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可见在外间看来是很神秘的。其时,军区调研组被人称为“谭办”。

“谭办”成立于1969年10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自然解散。谭甫仁被杀前后,我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蹊跷之处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11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12月15日举行的。谭很喜欢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巡游专州,13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由秘书事前拟好,15日他去会上念过,计划18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17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

个,仅仅剩下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拿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窄路就是军区机关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



授予中将军衔时的谭甫仁

码,就可以开柜取枪。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所有条件他都已具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回放

和谭甫仁 32 号后墙平行置建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 32 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这就留下了隐患——凶手王自正正好就是由此短墙爬进去实施了凶杀。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1970 年 12 月 17 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王自正是凌晨 4 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进了小院,他非常方便地便登上小楼,逼近了谭的卧室。

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清楚,径直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

王自正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他开枪把谭夫人射杀。

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

死顶紧夫人额头扳动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197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五时许,昆明城绝对安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惊天动地。手枪既已扳动,凶手接下来显然该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非命。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她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谭甫仁当时如果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凶手只有 20 发子弹,而且分装在两只手枪里。我们已无法证明装在凶手手中这柄凶器中具体的子弹发数,反正已经用去一颗,如果有人能够参与搏斗,将凶犯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改写。可惜,六姨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戴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沉睡正酣呢!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瞌睡太大?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几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 1975 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审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我

没有一手资料,对于其中细节不敢妄言。只记得某日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从重审地云南财贸学院回来,很是愤愤在我们办公室说了句“简直莫名其妙!”接着说了,你们知道那一晚警卫在干什么?和保姆如此这般!——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小伙子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妥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这位“猎物”在2300万云南人心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没完没了的政治争斗总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戏剧。

前面说了,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50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

轮不到谭甫仁将军,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被微缩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是早上6点。

冷面杀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非常从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开始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安然入睡。

王自正被监视居住于距离解放新村仅仅一两千米的西坝、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一年前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或其他嫌疑人等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俘管所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客观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中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中住房的具体位置,依稀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13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糊糊起床来,他给王自正指了指陈家位置。小孩对王很面熟,指路后又自个儿囫圇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中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了西坝。

一位正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家伙已被关押数月,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或这种关押本身就形同儿戏,漏洞百出。总之,后来的事实已经说明,平常凶犯时不时回家过夜,这种事监视者也浑然不知!监管形同虚设,不出事才反而不正常呢。

王自正已经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回到俘虏管理所,他心满意足地平静睡去。

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8号“谭办”值班室安睡。

离32号有相当距离的8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我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8号院值班室高卧。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1970年12月17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没来上班。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大门紧闭。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但见食堂对面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徘徊,在32号周围的草坪上做地毯式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寒霜将满地染得一片雪白,白霜上踏出的脚印狼藉杂陈。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我想,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有一点线索倒可能被这帮人破坏殆尽。

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去街面觅食,这才发现,1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事了。

忍着饥饿回到8号,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大感惊讶:

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8号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别致的

牢房。只是每天夜里都会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惊吒吒闯进来,手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要我将办公室、卧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就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某个角落。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到主任甫汉那间椭圆形办公室请示问题。四十多岁的燕赵大汉,正独个儿扑在办公室前伤心地哭。他说,首长已经走了,我还能说什么?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按照军区统一布置,我们就每人写出交代,以小时为单位,详细说清那些天各自所作所为,包括每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去食堂吃饭未遂;几点,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学毛著、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一人散步;几点,在阳台上独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了,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为有作案嫌疑。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日多案件侦破仍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生气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我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于是全军区开始查验枪支,某日,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突然发现保险柜中两支五九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翼而飞!保密室的门窗绝无撬动痕迹,保险柜暗锁完好无损!周恩来所指问题在内部,可谓千真万确了。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重责难逃,在学习班开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1968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将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首长们大会小会都爱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目击者被重新提上来。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六姨已经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岁的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查询。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亲为谁。70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马苏红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玩耍嬉戏。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纳闷了: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俘管所吗?身被羁押,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三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打扫庭院。马苏

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走向队尾,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他对我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见许多士兵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篦似的摸索寻找那支保卫部遗失的“五九式”手枪。在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支——可以认定王行凶后返回途中把枪扔进了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



1967年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弹,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还剩下多粒。杀手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往门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无路可逃。枪声把守候南屋的战士全都惊醒,他们纷纷提枪对冷面杀手射击。

王自知逃脱无望,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扳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

凶案余音

凶手王自正,河南内黄县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在此前二十余年的1947年,内黄县武拐村曾发生过一起凶案:富农分子王某实施反革命报复,曾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王某于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首犯既歿,所有线索亦随之中断,案悬二十余年再无续事。文革“清队”旧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纸公函直寄云南省革委,接着呈报谭甫仁。其时昆明军区本已决定将王贬去文山自治州军分区保卫科任职,既有人举报其旧案涉身,且所涉案情严重,那就把他揪出来吧。谁说中国人做事不讲究量化管理?那时候搞任何政治运动,总是揪出的阶级敌人数量越众多,革命成绩就越伟大。于是该王被隔离在俘管所,一关就是七个多月,自由遥无定期。

姑不论当时本无法制可言,仅就事论事,这儿至少有两个问题存疑:一,该王如真为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把名字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确属彼王致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事实上,案破

后披露的大量证据表明,监管七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王畏罪自杀,当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发生在内黄县武拐村的凶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断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桩更大的凶案:将军喋血,全国震惊。这不是对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莫大讽刺么?

再说谭甫仁。将军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尴尬困境。如果按当时标准来划线,“四野”出身的谭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彪路线: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就算是一个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发生,他会不会莫名其妙也被卷入别样的政治劫难?这也是个变数。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说专案组。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经在北漠摔个粉身碎骨,那么,让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继续主持破案显然已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军区的老人重新组阁。赵专案组的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必须用够。7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来又整甲派。专案组要翻翻“烧饼”当然毫不足怪——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75年,邓公小平复出主政,这才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申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

逝者已矣!现在,无论怎样评说谭案中那些个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包括每一个细节,甚至为此争个喋喋不休,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昆明军区32号院里的惊天大案,包括凶案侦破过程本身,都那么鲜明、那么无奈地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剧——这才是需要人们记取的。(责任编辑 萧徐)

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

● 王生甫
杜佩玲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日本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以及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筱 都把诱降阎锡山的工作放在首位。

“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存在和发展,保住“华北王”的地位,他认敌为友,联日反共。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权力,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对此,他于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前作了如下表白: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 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们,这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吉县)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战区长官部机要处副处长)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西樵(即梁上椿,山西省公署参议)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到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

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三、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的使节互访、洽谈的真实意图是想暗中借助日军的力量灭共拒蒋，而不是要把他的军政大权都被日军操纵做傀儡。他所谓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句话的谈判原则，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内政自理”这一条。但他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虽然他坚持不像汪精卫一样去公开当汉奸，但他却充当了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精卫之类的角色，与日军互不侵犯、联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虽然汉奸的名分还尚不完全具备，但已有汉奸之实的事实却是无法推卸的。

六年中阎锡山与日寇进行了六次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无等“协定”，对抗战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日会谈就有六次，由阎锡山亲自参与的有三次，并与日军签订了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相互配合进犯抗日根据地等多条“协定”。这六次密谈是：

一、白壁关会谈。双方代表在孝义县白壁关村日特晋中公馆工作人员白太冲家中进行，前后两次。第一次是1940年11月。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行人员为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在会谈中，楠山秀吉提议：日、阎双方取消敌对状态，互相提携，共同“反共”。赵承绶表示原则同意，并希望日军撤出孝义、汾阳几个县城，供给武器。会谈未就实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请示上级后再谈。第二次是1941年3月。日方代表为宫内幸五郎，阎方代表为赵承绶。双方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让阎军进驻。此项协议于同年6月实现。

二、汾阳会谈。自白壁关会谈后，阎锡山闻讯

日军将进攻阎军,来往曾中断一时。经过日本军方派大仓商事日本顾问林龟喜作为非正式军使赴吉县直接转达日军意图后,日方接受了阎方关于在离石县一带对共军作战的要求。1941年7月,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于是决定9月10日,两军代表在汾阳城内签署正式协定。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阳县城内会谈。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随员有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员有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等。会议结果双方代表在《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上签字。此协定分为“方针”、“要领”两部分:

方针

(一)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

(二)依据于南京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国内之政治及军事由中国方面自理。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全华北。实力充实时即行努力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

(三)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要领

第一阶段

(一)晋绥军与日本军缔结停战协定。

(二)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此时为日本占领)交予晋绥军,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区域推进,阎长官移住孝义县城或隰县,与日本军紧密配合。

(三)合作实现后,日本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绥军担任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商定之。

(四)晋绥军兵力三十万,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

由山西省内补充。武器由南京政府给以下列数目之补充:

步枪十万枝,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九百挺;掷弹筒四千个;各种炮三百门及所需之各种弹药。

关于粮食与服装,就地征发,由日本军予以援助。

(五)为整理晋钞,予五千万元之透支借款。

(六)在执行协议期间一面秘密联络各反共将领,一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

(七)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

(八)以上各条,必须秘密地,并在可能范围迅速施行之。

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阎长官即向重庆政府督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

(二)第一阶段之军队部署及军队补充完成后,与日本军合作,首先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

为此临时支给二千万之军马、武器费,另外每月军费为二千万。

(三)山西共产军肃清后渐及华北全部。此时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武器及其他所需之弹药、汽车、步枪十万支、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挺、掷弹筒二千个、其他炮三百门。

(四)晋绥军兵力五十万,由山东、河南、河



1934年11月8日,阎锡山(左)与赵戴文(中)在山西太原机场迎接蒋介石

往 事 录

北、安徽等地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

(五)恢复太原兵工厂。

(六)在此期间,联合各反共将领,向和平统一方面迈进。

第三阶段

(一)负责维持华北全境治安。

(二)由南京政府支給华北善后费一万万元抚恤军民。

附带条件

(一)察哈尔、绥远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之解决,概由汪、阎商议决定。

(二)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承认完整归还,俟阎长官回来后施行。

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日起生效。

日、中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晋绥军代表

赵承绶

大日本华北派遣军代表 田边盛武

关于上述协定中,虽未明确雁北十三县的归属,但在会谈中日方已承认阎锡山实行“山西自治”,为完整山西政权,将现属蒙疆区管辖的十三县仍归划山西范围。

在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的当日,日军楠山秀吉和赵承绶又签订了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晋绥军与日军互为友军,彼此合作,为向共同防卫之目标迈进,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条 晋绥军与日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本共存共荣之旨,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立新亚洲,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而密切合作。

第二条 晋绥军自本协定缔结后,尽速向协定区域发展,日本军当予密切合作。

有关实行此项条款之具体事项另行协议决定。

第三条 日本军协助晋绥军之整编、训练及补充军械。对于征集粮秣,应互相协助。

附则

本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 楠山秀吉

晋绥军代表 赵承绶

以上两个协定因都在山西汾阳签订,故通称为“汾阳协定”。11日上午签字结束后,日军设宴招待阎方人员,并赠送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

“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于1941年10月,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五万名(由原先承认的十万人减至五万),步枪十万枝,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两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两万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7、阎方派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张文(少将)驻运城,宪兵司令部服务员刘虎文驻临汾,骑一军参谋杨向山驻汾阳,分别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驻军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三、安平会议。1942年5月5日,日、阎双方又在山西省吉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随员

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边田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员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参谋长齐凤洲等。会上，日方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给枪；阎锡山则坚持先要兵要枪，然后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日方指使苏体仁、梁上椿居间讨价还价，也无结果。阎锡山乘休会期间溜出会场，不辞而别。会议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1943年春，日方又主动提出，双方先实行“部分合作”的建议。阎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方参加谈判人员为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笹井宽一。阎方指派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缜武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提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条。双方经过具体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个县的伪县长、保安队副大队长和警察所长(地区和人员名单略)。第二批选派靳祥垣充任日伪山西省卫生事务局长，随带秘书主任毛德如、秘书卢宪武、科员李呈祥，另派陈兴舜充任日伪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总务处长。

2.经济方面：①1943年秋，在太原设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董事会，由日方笹井宽一、河本大作、高桥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阎方彭士弘、贾英云等五人组成。②日、阎双方进行物资交换，在笹井宽一主持下，日方派大仓洋行高田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原敏郎参加，阎方派曲宪南、吴子青参加，先后交换六次。

3.军事方面：①日方接纳阎方代表第二战区长官部在临汾设立办事处，与日方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联系，交换情报。②1943年12月，由日方接应阎方六十一军约八千人由临汾渡汾河进入浮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又接纳阎方第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渡汾河增援，日、阎两军配合进犯中共领导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③1944年春，

日、阎双方各派部队夹击中共领导的晋南栾王山抗日根据地。

五、瑶圃会谈。1945年6月下旬，日、阎双方在山西孝义县瑶圃村进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随行人员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还有阎方驻并(即太原)办事处人员、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缜武、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等。高桥坦表示希望阎锡山早日到北京，在日军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阎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这次会谈未取得一致意见。

六、司马村会谈。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阎双方在山西省汾阳县司马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为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双方协商了日、阎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1938年在陕西三原东里堡养病的赵戴文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尽管阎锡山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叛国,且在与日军、汉奸苏体仁等勾搭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战的活动,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完全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

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成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谕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缜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本文根据《赵戴文评传》第十四章整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我在华懋饭店当西崽

● 杨孟亮

屹立在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大厦，解放前是著名的沙逊大厦，为英国大地产商维克多·沙逊爵士所建。大厦始建于1926年，两年后落成。正面为12层，后面9层，屋顶筑有一高达近20米的草绿色方锥形尖塔，面临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气势宏伟，壮丽美观，人称远东第一楼。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这座当年有名的大楼，和现今对峙在浦江东岸的几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楼相比，已相形见绌，显不出昔日的风采了。但内部的布局设施，依然相当高级和特殊，所以和平饭店仍不愧为五星级饭店。

抗战前后，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西崽，也就是服务员，曾在这家饭店工作多年，看到和经历了别人不易遇到和了解不到的人和事，以及敌我双方的较量。虽然已经过去六七十年的，但许多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出生在福建省靠近福州市的一个港湾马尾镇，那里是国民党海军的主要军港之一。我父亲是一名海军水兵，经常出海，顾不了家，因此我家的生活特别困难。我刚满一岁，母亲就只身带着我到上海投奔在我姑姑家中，帮她家料理家务，以此维持我们母子俩的生活。我勉强读完初小四年级，1932年12岁时就经亲戚介绍进入到华懋饭店，当一名成天站在九楼餐厅门口为客人拉门的小郎，开始了伺候阔人的屈辱生涯。

当拉门小郎三四年后，我先当小西崽，后升任正式西崽。我至今仍记得洋主管对我们的训话，说什么“你们得好好给我干活，要知道我找一百个西崽比找一百条狗容易得多。”为了保住饭碗，我忍气吞声，拼命干活，扮演了鲁迅笔下的“见洋人躬身哈腰，对同胞歪首斜视”的洋奴才

角色。记不得是在1933年还是1934年，反正在我当拉门小郎期间，英国的著名作家肖伯纳曾到上海来，就住在华懋饭店七层的一间客房里。一天，鲁迅身穿长袍，脚上穿着一双跑鞋，来华懋饭店拜访他。不知是不是这双跑鞋让饭店开电梯的服务员瞧不起，把他当成个土老头，死活不让他进电梯上楼，弄得鲁迅十分狼狈也极为恼火。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件新闻传开了。所以鲁迅这样讲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求知心切，酷爱读书，除上夜校补习外语外，还经常光顾书店和书报摊，认识了一位在我家附近摆书报摊名叫黄务元的摊主。黄原是神州国光社的职工，思想进步，人很朴实，他对我特别关照，他书报摊后面往往藏有一些进步报刊，经常偷偷塞给我看，日子久了，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些进步书报刊，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许多抗日革命的道理，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要投身革命，报效祖国，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我记得当时从黄务元那里不断能看到一份《江潮报》，后来我得知，是一位姓邵的同志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带来的。邵表面上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实际上是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他和黄务元很熟，我估计黄的书报摊就是他的一个联络点。黄介绍邵和我认识，我们一见如故，他向我讲了很多国内外新闻和抗战形势，使我深受启发。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十分钦佩他的人品和学识，并愿意尽力帮他办事。他曾通过我在一艘长江轮上工作的好朋友朱培德偷运过一批货物到苏北；他要购买西药，我介绍过一个姓陈的西药商和他联系。但不幸的是，一次几个日本宪兵突然到他家抓捕他，他翻窗跳楼逃跑，不慎失足摔下牺牲了。

约在 1941 年间，黄务元又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陈波涛和我认识。陈早在 30 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秘密发行工作，1940 年后受李正文同志领导，李是一位学识渊博，懂英、俄、日三种外语，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派在上海专搞对日伪的情报工作的。

陈对我在华懋饭店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作为这家大饭店的西崽，我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高级人士，包括汪伪头目的活动。特别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懋饭店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了一个军管单位，但饭店照常营业，这里成了日伪机关和他们的高级人士经常活动（包括开会、密谈等等）和吃喝玩乐的场所。新来的日籍经理是在日本管理过大饭店的行家，相当精明。饭店服务人员的原班人马不变，我因是老西崽，服务工作周到，能够察言观色，熟悉各类客人的喜好，加上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和日语，深得历任主管的信任和赏识，许多重要活动都派我去参与安排和服务，使我有许多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敌人的一些机密活动和内情。而西崽这身白号服也具有很强的保护色，得以迷惑敌人而不受注意。

华懋饭店在日本海军接管后，原来十层沙逊住过的豪华套房，住进了一个日本海军大佐，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经常见到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来这里活动。陈波涛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密切注意他们（包括日方）的动向，搜集有关他们的活动情况。

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福间每周要在华懋饭店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日伪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都来参加，但这是公开活动，无情报价值。有一次福间开完新闻发布会后，特地开了一间房间，邀请一个中年男子共进晚餐并谈话，由我服务。我发现此人在向福间汇报苏北新四军的情况，引起警觉，就在门外注意偷听，他们两人都未注意到我。我得知此人是日方派往我新四军地区的特务，可能是个头目，他向福间谈到，说那边他已派人安排妥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云云。这说明他们刚在我方安插了密探，一切布置停当了。我无法探听到向福间汇报的这个家伙的

身份和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貌特征。这一情况我第二天就告诉了陈波涛同志，陈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

在这之前，陈波涛曾问起过我，有无办法可以买到军火。因为他知道我们一些福建同乡有私自买卖军火的活动。我就向我当海军的父亲打听。他说他认识一个姓林的同事，现在汪伪海军当一艘舰艇的艇长，这个人过去就干这种行当。我告诉陈后，陈就要我通过我父亲设法找到了那个姓林的艇长，介绍给他认识，以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1942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日本主管交待我到十层的豪华套房，为那位海军大佐做房内的餐饮服务。原来大佐那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是一个能讲一口地道日语的白俄女郎，此人我曾在一次舞会上见到过，我心想她这次不知怎么和这位大佐勾搭上了。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玩的很开心，最后杯盘狼藉，我退出房间，他们在里间卧室上了床。

到了将近半夜，我听到了大佐打鼾的呼噜声，准备去收拾一下杯盘，就轻手轻脚地推开书房门，眼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书桌上亮着台灯，一只公文包打开着，这位金发女郎半裸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我脑子里立刻闪出“间谍”两字，她突然见我进去，也吃了一惊。我沉住气，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俯身在桌上匆匆收拾了酒杯酒瓶，拿了空盘碟，迅速退出房间，到服务间里洗涤餐具。不一会儿，那位金发女郎披着睡衣跟了进来，塞给我一叠储备券（当时沦陷区通用的纸币），我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就不露声色地收下了，并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这件事就这样悄悄结束了。这是我见到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不过我猜不透她是英美间谍还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向陈波涛报告后，他要我保持沉默。

1943 年 3 月间，我得知陈公博将在华懋饭店八层舞厅举行一次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招待酒会，许多日伪头面人物都要来出席。我在两个星期前得到这个讯息，就立即报告了陈波涛同志，并向陈提议，机会难得，可否搞一次爆炸行动，可以事先在开酒会的舞厅隐蔽处放一枚定时炸弹，到时候把这批瘟神煞煞轰上天去。陈开

始也很动心,并特地换了一身西服,装成阔佬,由我陪着他悄悄察看了现场。但此后再没有动静。招待酒会举行前夕我见到了陈问他怎么办?他告诉我,上级组织不同意采取这类过激行动,这件事就此作罢。

同年夏季,华懋饭店八层舞厅还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慈善舞会,由一个姓许的银行家出面主办。这个舞会的全称是“上海各界慰劳日本皇军伤病员慈善舞会”,有300多人参加,是有关方面借此向各界敛钱的一次活动。舞会的收入相当可观。参加者主要是上海各界名流仕女和伪政界人物,我记得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夫妇、市府秘书长赵尊岳等,还有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这位昔日著名的交际花在舞会上丰姿绰约,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几乎成了舞会的中心。

我十分纳闷,孙科是国民党堂堂要员,远在重庆,他的这位如夫人,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乌烟瘴气的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慰劳日本皇军的慈善舞会,还如此招摇过市,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她究竟是想要干什么?会场里的女眷太太们也都在议论纷纷,对她评头品足,表示不屑。

但据陈波涛同志后来告诉我,我方也获得有关信息,说有个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估计就是蓝妮,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南京、上海之间,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寇的和平攻势和劝降政策,派她来充当试探蒋日伪合流的可行性的先遣“特使”。陈还说此事已反映到国际上,苏联政府特地以此事为例,向重庆蒋政权提出警告,实际是借此揭穿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蓝妮这个神秘女人从此也就“消失”了。

我参加这次舞会的服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午夜12点钟才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清晨五六点钟,突然被一阵“砰砰”的猛烈敲门声惊醒,只听见门外有人一面使劲敲门一面喊叫“快开门!”。我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大个子站在门口,命我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问他去哪里,他不耐烦地说:“特高课,快一点!”我吃了一惊,心想糟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赶紧穿好衣

服,硬着头皮跟他走。他带我步行到福州路的伪警察署,那里离我住处只隔一条河南路。他把我带到了二楼特高课的一间办公室,要我等着,就走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我发现我曾到这里来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家楼下开设着一家挂着“美国书店”招牌的书店,那里常卖一些进步书刊,当时在孤岛上海是很诱人的,还设有一个服务部,专门预约读者所需要的书刊,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后来陈波涛特地告诉我,说这家书店是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开设的“钓鱼”书店,不知有多少不知情的进步青年落入了他们的陷阱,要我小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伪警察署特高课来查封这家书店,一个探员上楼来打电话,走过我住的后楼房间,发现我房里有书,进来查到一本《丁玲选集》,就拘留了我,把我带到警察署这间办公室里,一个日本探员和一个姓谭的中国探员(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向我来了解过此人的情况)审问了我,因未发现我其他任何问题,两个星期后就让我交保释放了。释放前谭某还对我“训话”,要我出去后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



20世纪30年代的华懋饭店沙逊大厦

所以我这次是“旧地重游”、“二进宫”了。

房间里清静得很,我因凶吉未卜,心中忐忑不安。窗外外滩江海关的钟声响了七下,知道已是早晨七点钟了,我镇定了一下情绪,思考着应对的办法。不久我见到第一次被捕时认识的那个日本探员和姓谭的探员匆匆进来,径直向里间的办公室走去。一会儿,厨师端来了三客西式早点,分别送给我们三人。我吃着早点猜想他们不像是把我当犯人抓来,略觉宽心。

吃完早点后,他们把我叫到里间办公室,谭某面带笑容地问我昨晚慈善舞会的事,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起昨晚这特高课的两个探员曾到舞会来转过一圈走了,谭某还和我打了一个照面,肯定认出了我,知道我在华懋上班,大概是为了了解舞会的整个情况,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来。我约略地谈了舞会的情况以后,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要我设法查明后再去告诉他们。包括何人主办此事,有多少人参加,其中有哪些要人,舞会共有多少收入等等。

隔了一天,我就把他们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去伪警察署告诉了他们,谭某听后表示很满意,并要我以后凡华懋有什么重要活动随时到他们那里去谈谈。意思很明白,是要我当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眼线”,也就是上海人很鄙视的所谓“三角麻子”(为虎作伥的鹰犬)。

我把舞会的情况和特高课找我去谈话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报告了陈波涛,他对蓝妮的事很感兴趣,并觉得特高课主动找上门来,正好可以趁机打进敌人营垒里去。但几天以后,陈又来告诉我,组织上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和特高课沾上关系极为不妥。因为我现在是在日本人军管的华懋饭店卧底,而如果又去充当同为日本人管辖的警察署特高课的“眼线”,实际上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敌人是要我为他们“火中取栗”。加上“巧遇女间谍”、“二进宫”等经历,虽有惊无险但隐伏着很多危机。最后他们研究决定,我必须立即摆脱特高课,躲开他们的纠缠,要我马上设法撤出华懋饭店这个是非之地,以绝后患。

但我不能立即突然离开华懋饭店,公开辞职或悄悄溜掉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周围人们的猜测不解。因为当时时局动乱,民不聊生,要找到像我在华懋这种收入比较稳定的职业并不容易,

谁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它放弃!所以要丢掉这只“洋饭碗”,还必须找到既合理又适当的借口才行。

我最后采取了自毁形象的办法,一改过去办事小心谨慎,洁身自好的习惯和作风,装作日渐变得颓废堕落,贪杯爱财,故意多次偷喝洋酒,私拿小费,在客人面前失态等等,严重违反店规,终于达到被华懋饭店主管开除的目的。约在1943年秋我悄然离开了这个战斗多年的阵地。

一个多月后,我经友人介绍,进入了南京路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苏籍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重操西崽旧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抗战胜利结束后,我的上级领导人李正文同志的党的关系从原共产国际转回到中国党来,直接受张执一同志领导,我也于不久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公开职业仍一直是马尔斯咖啡馆(现改为东海饭店)的西崽,而这个外国人咖啡馆就成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接头、传递信息的一个可靠联络站。

1946年至1947年间,我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班学习,那里聚集了很多进步同学,全校中共地下党员就不下二三十人,该校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我们还组织过一个校外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先进同学,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以后,我曾参与策反过国民党海军军舰“长治号”的起义,并协助有关同志胜利完成了爆炸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还担任过地下交通员以及和浦东我游击区联络等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我和民治新专同学地下党员张惠卿、陈贤康一起,协助一位进步老师李毅夫,趁国民党镇江集中营迁往上饶的混乱之机,从那里设法营救出了一批(约10人)被关押的我党干部,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张符瑛、刘永青、孙美、张聪敏等人,我们在上海为他们找到住所隐蔽起来,以后又帮他们安全离去,分别寻找各自的组织归队,从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从地下转到地上,终于脱下了这身西崽的白号服,穿上了上海军管会的黄军装,成了一名革命干部。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国教育值得深思的问题

● 钟沛璋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愤怒地呐喊:“救救孩子!”鲁迅以“狂人”的目光,揭露当年的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罪恶社会。

八十多年过去了。从人吃人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孩子们的命运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就教育状况而言,很多孩子们的家长和关心社会未来的人们仍在呼唤“救救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应该为我们民族造就人才的摇篮、为中国开拓未来的教育,这些年来,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高的学费把成批成批的孩子拒之大门之外,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神圣的权利。沉重的学习负担,无休止的做题、测试、考试、课外补习,又扼煞了在校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使他们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求知热情,成为没有灵性和个性、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的做题机器。厌学、逃学成为普遍的现象。“一考定终身”,还有的孩子因为通不过中考、高考的闸门,被逼走上自杀的绝路。2004年3月11日,重庆的两名高中女生,相抱从楼顶跳下,在遗书中写道:“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在新中国竟出现了这种现象?

我认为这首先是由于缺乏远见,我国的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负责两会的宣传报道工作。两会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今后应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政府工作报告的庄严承诺,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与会的近

60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发智力,成为当时两会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人大大会秘书处收到代表们有关开发智力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达381件。政协大会秘书处收到委员们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达120件。代表和委员们的热烈讨论也鼓舞了我,使我看到党心、民心心连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发全民族的智力,正在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我以《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的述评报道。我在报道的最后写道:“在本世纪初,中华民族曾被称为沉睡的巨人。在本世纪中期,沉睡的巨人觉醒过来,推翻了三座大山。完全可以预期,到本世纪末,已经新觉醒起来的中华民族,将把‘一穷二白’的帽子远远抛进太平洋而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教育经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看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消息: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这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她尖锐地批评: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4%,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的目标值。据统计,在1993年以来的10年间各级政府实际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也就是要农民自己负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

这就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农村校舍危房造成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杯水车薪的“希望小学”,竟成了农村教育的希望。

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的匮乏就必然造成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批孩子被挤落淘汰的惨状。中考关,就有40—50%的升不了高中被淘汰。而在过关被淘汰前,已有许多孩子因厌学、逃学早离开了学校。想想看,十几岁的孩子,上不了学,被抛入社会,能干什么呢?除了一小部分充当童工外,就只能闲逛。进不了学校,有些人就进了监狱。这是中国少年犯罪,犯罪低龄化的重要原因。

有人辩解说,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国家穷,要先发展经济,才能发展教育。这正是缺乏远见的错误言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他们走的恰恰是教育优先的道路。这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政府刚成立,就派出由政府所有主要成员参加的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求知识于世界”。回国后,全国上下形成了发展教育最优先的共识,教育经费在各项国家预算支出中最多。经过短短十年时间,日本国民识字率就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国民经济已处于衰败的境况,甚至不抵当时的中国。日本却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在我们中国连年搞政治运动,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日本经济却飞跃发展,直逼超级大国美国。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也重视教育的美国和日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羡慕地称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多年来,经济连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却为什么还是处于这种老牛破车的地步?据教育部政策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国现在每年只要多投入500亿元到600亿元就可免掉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收费。难道我们真的就找不

到关系到我们民族发展命根的一笔费用吗?

当然,要教育部门独立来解决教育问题这是不能承受之重。但是我国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却把已经稀缺的教育经费,往往又着重用来做表面文章。例如不扎扎实实地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却要搞创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一二十年下来,其效果如何呢?人们发现,连国人万民仰慕的大学如北大、清华,还排在世界二百名外!在基础教育中,许多教育行政部门又热心搞什么“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重点学校,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高升学率。人们看到,只有进了重点中学,才有希望考入重点大学,上得重点大学,就有希望来日取得好职位。“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于是在家长、学校、社会的层层压力驱赶下,多少孩子都陷入了喘不了气的做题、死记、硬背、应考的困境,戴上了眼镜,驼了背,变成了“豆芽菜”。但是人们还是拼命向重点学校挤。重点学校就趁机高价招收“择校生”。哪些人当了择校生呢?人们发现又多是靠“票子”、“门子”和“关系”进来的那些子弟。优质教育常常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这种不当的教育政策,人为地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

当然,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现今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就是一所私立大学。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占71%,印度占59%,香港占55%,台湾占59%,韩国占80.5%。我国在解放前兵荒马乱年代,民办学校的人数还占大、中学校学生总数的40%。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大力鼓励民办教育来扩充我国的教育资源呢?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政府的鼓励下,我国的民办教育一度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现有的民办教育,又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先是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民办教育既然是靠国家经费而民办,就得按市场的规律来运行。但是有的教育部门领导人说,教育是公益事业,不是产业。这样银行就不给贷款。民办学校,在国内很难融资,国外资金也无法引进。

事实是，在堵塞民办教育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堵塞了国外的资力和智力在中国兴办教育的可能性。今天国外有雄厚资力和智力可以为我国发展教育所用。例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 11 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 4400 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在中国却因为限制太多，无法办理。人们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引进了这么多外资来兴经济，为什么不能积极引进外资来兴教育呢？我们既然能送这么多的学生到外国去接受外国人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引进优秀的外国教育家来中国办教育呢？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世界向全球化发展的当今，封闭只会使自己落后，利用外力可以发展壮大自己，何乐而不为？

我以为，把教育作为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性事业，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我们是从校长的任命，从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出什么试题到用什么试卷，以至学校的财务，无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和控制下。中央教育部门有统一的高考，省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则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和年终测试。一切围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各级学校都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一切听命于统一指挥，我国也就再出不了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那样杰出的教育家。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存在种种弊端，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只是无奈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教师在课堂应该自由地讲授其研究的课题，责无旁贷地传授他所发现的真理。这是学术自由的首要原则。在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就很难有学术自由。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就没有知识进步，就不会有一流大学。这就不难理解，几十年来，为什么美国大学能造就几十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一百多位像比尔·盖茨那样亿万富翁的科技领军人物，而我国的大学却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我国的国家科学奖，一等奖已连续几年空着无人领取。

权力垄断还会造成腐败。教育资源短缺，这些年来给高收费、乱收费、发财制造了良机。学费猛似虎。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十元，现在已超百元以上。城市里一些热门中小学校的择校费或赞助费往往高达数万元。学校还收取名目繁

多的各种费用，如强化班费、补课费、辅导材料费等等。一些学生千辛万苦闯过了独木桥，考上了大学，桥那头却伸着一张要钱的巨手，每年的学费高达上万。一些农村孩子的家长交不上这样的巨款，被逼向学校下跪者有之，被逼自杀者有之。对于城市的家长，高额学费，也同样是不胜负担。2004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我国大学学费比 1989 年增加了 25—50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 2.3 倍。一位福州的家长说，她女儿读大学四年，花掉了 10 万元，使她倾家荡产。教育当局虽然多次明令禁止高收费、乱收费，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发财的好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就首先得了重头。如择校费就是统一纳入教育行政部门账号。巨额的教材、辅导材料的利润，就有很大的回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披露，广东化州教育局用学校收费的 584 万元钱盖了自己的楼，以 626 万元钱用于餐费等用途。广东吴川是个穷县，该县的教育局竟有 17 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都张开大口吃喝，餐费高达 611 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竟高居首位，教育还成为中国当今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教育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使人人受到教育，是所有执政为民的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这种做法，却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了原有的差距。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扶贫首先要扶贫困地区的教育。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人为地不断扩大差距，如不制止，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造成我国社会的极大不稳定。

我国教育的问题，还造成一些少有的现象。许多家长为使孩子逃避应试教育的折磨，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地把还在上中学的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去留学。留学的低龄化，世界少有。目前我国大学的一些学习尖子，还纷纷流向外国。中国的

一流大学,成了美国一些大学的预科。许多留学生又把取得外国绿卡,作为最高奋斗目标。大批留学生在海外滞留不归,这与新中国建国初期大批留学生排除万难,争取回来报效祖国相比,真是太值得大家思考了!

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使人呼喊救救孩子,救救中国的未来!?

在使人无奈之际,在我的故乡浙江,忽然传来一个喜庆消息:2004年9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习近平在全省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上宣布:今年全省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成为全国省区中的第一家。全省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学率达85%,小学入学率达99.99%,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例达99.98%,初中入学率达98.4%,巩固率达99.85%。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比例达87.5%。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7.35%,流动儿童少年(民工子女)入学率达96.9%。浙江高等教育也有飞跃的发展。高教毛入学率已从原来的8.96%,提高到30%。高考录取率从35%,提高到76.6%。看到这样的好消息,真使人“漫卷诗书喜若狂”。这年10月,我偕老伴,以衰老之躯,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走访了许多学校,从农村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到大专学校。二十天中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足以使人感到高兴,感到鼓舞。所到之处,我们看到当地最好、最新、最敞亮的建筑,必定是学校。我看到我国当今最现代化、壮观的高教园区(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也看到当今我国的弱势群体民工子女孩子们,在阳光灿烂的校园内游戏,在课堂里上课。省教育厅副厅长张绪培说,浙江正从沿袭下来的精英主义教育,向全民的普及的大众教育转型,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读上书。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说,就是要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而原来的教育是寻找适合教育的孩子。过去是层层筛选,不断淘汰的办法,是所谓象牙塔,越到高处越尖。浙江的十五年教育,不是尖角,而是矩形,人人都要受教育。

我们到处访问、座谈、听取介绍,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浙江怎么能取得这样喜人的成绩?听来听去,我想主要是这样几点:

一是思想上对教育的重视。浙江历来有耕读

传家的传统,大家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祝英台是上虞人,一个女孩子为了求学,竟女扮男装远涉百里到杭州。在杭州万松书院与来自绍兴的男孩子梁山伯相遇,于是就有了难分难舍的同窗友谊和爱情故事。现在浙江的老百姓,家家都把子女读书上学,看成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农民说:“爹是梁,娘是墙,孩子是窗。”有窗才有光明,才能看清前途。而有了文化、教育,窗才能明亮。浙江的乡镇干部说:“扶贫最重要的是扶教育。孩子有了文化,就有本事闯世界。”浙江的党、政领导顺从民意,摆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位置,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努力把建设教育强省作为建设经济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基础工程来抓。

二是浙江省领导办实事。宁波商人爱说“闷声大发财”。讲实干,而厌恶嘴上乱吹。浙江民营企业搞得红红火火,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浙江的领导扎扎实实办实事,不拉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取得成绩也很少开庆功会。这些年来,浙江省领导扎扎实实做的一件事,就是全省推行创教育强县活动。浙江实施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县级政府举办基础教育责任,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创教育强县活动的推行,在全省上下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齐心协力办教育的良好局面。特别使人感动的是浙江省在保证弱势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教育的努力。省政府决定将原来每年1000万元扶困助学专项资金增加到3000万元。从2004年开始,省还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农村中小学开展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让农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许多地方采用发放“教育券”形式,保证贫困学生得到资助。浙江各地还高度关注进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或是举办专门的民工子女小学,或是把民工子女就地安排到各学校学习。他们认为这不是一种恩赐,不是一种额外负担,也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而是地区政府责任所在,责无旁贷,是促进城市化工程,化不稳定因素为稳定因素和进步因素,功在千秋的事。包括来自各省到浙江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巨大,正是思

想上这样高瞻远瞩的认识,这些民工孩子,96.9%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兴办教育。浙江省专门制定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各种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积极探索。这个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众人拾柴火焰高,各类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1998年至2002年,全省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总投入达440.51亿元,占同期浙江省教育经费总投入的39.4%。我们来到出过王国维、徐志摩、陈学昭、蒋百里、金庸等名人的历史古城海宁,下车伊始,市领导首先带我们看的就是一所民办学校——宏达学校。这所学校是1985年一家校办企业创办起来的。开始只是为外出打工的子女办一所寄宿学校。现在已发展成为有二千学生,七万五千平方米面积,总投资近一亿元,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学校。他们办学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喜悦。从学校老师、学校创办人宏达公司董事长沈国辅,到市领导的表情中,可以看到他们都为这所学校的成功感到喜悦和自豪。截至2003年年底统计,浙江全省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0932所,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在校生总规模达131.9万人,约占全国的九分之一。

浙江的教育,像浙江的民营企业一样,都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有开放的而不是垄断的管理体制,有真诚为民造福、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我国教育事业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

浙江的教育还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省教育厅的领导向我们列举了许多。我们虽然只是走马观花,还是看到老师们的忧虑和困惑。我们来到台州的温岭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却又全新的学校。虽然我们已经在浙江参观了许多漂亮校舍的学校,但看到这所造价2.6亿元、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的县级中学,还是大开眼界。陈才校长是浙江省的功勋老师。他把自己的教学科研成果编了两厚册。在座谈中,一位特级老师说:老师们干得十分辛苦。每天早晨六点多十分就得赶到学校。学校在山区,老师们骑着

摩托车赶来,已有好几位老师摔折了腿。学校的高考录取率是90%,其中50%是被国内重点大学录取的。但是社会对学校的压力还是很大。他们问:高考状元为什么不出在温岭中学?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看来即使是功勋教师和这样现代化的学校,还是逃不出应试教育的压力。

在浙江访问期间,我看了《钱江晚报》的介绍,买了一本王宏甲写的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是一位曾获中国图书奖的部队作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但是像所有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从1995年开始,他从东海之滨跑到长江源头,从繁华都市跑到荒原戈壁,历时十年。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亲历亲见、有关教育方方面面发人深思、引人警醒和感人的故事。王宏甲对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世界教育的大趋势,进行广泛调研和深度思考,他指出,我国教育正处在有史以来第三次大的变革和转变,其核心是要使灌输式的被动的教育,转变为自主的、探究性的学习。这是跨越五千年的重大转变,是一场真正的学习革命。鼓励和培养孩子对探究知识的好奇心,永远保持探究的乐趣,是通向成才成功之门。王宏甲预言:中国新教育的风暴正在来临。读了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的确受益匪浅。有的读者说这本书不同于教育的“病危通知书”使人只想哭,而是看到了希望。但愿王宏甲预言的新教育风暴,吹得蓝天一片新,天下孩子尽开颜。

(2004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 致 中)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住医院听友人说:11月19日《文汇报读书周刊》有一读者反映,《炎黄春秋》第10期我写的《李敷仁:传播百姓的声音》一文,共商创办《老百姓》报有“郁达夫(创造社领导人之一)”,这是错的。当时郁在上海,是我把余达夫误为郁达夫了,请贵刊予以更正。因未查出这位读者姓名,特致谢!

李纪阳

2004年12月1日

编者按:最近我们收到读者刘夏、刘令蒙等同志来信,指出李文中的“郁达夫”应是“余达夫”。

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 高秦伟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的手中。”当伯利克里面对雅典人这样阐释“民主”的时候，他全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人几乎动用了全部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让各种完全不同、截然对立的政治体制同民主挂上了钩。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宣布自己是民主的政府，是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权力的。民主恰似一顶帽子，任何人都可以戴。追求民主是没有错的，这个词本身的来源就是人民之治。“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对个人最好的保护是由人民来选择管理者，并使之对人民负责。”可以想象得到希腊城邦中的公民是多么踊跃地投身于政治生活中，此种图景无疑给深受压迫的人们以无限的诱惑和殷殷的期望。

但自其后，在西方的语境下，民主却是一个贬义词，常指暴民统治。阿奎那、洛克、康德等人都明确表示反对民主政体。美国建国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中写道：“如（希腊与罗马般的）民主……很难与个人安全、财产权利相容，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因而也拒绝民主。民主的流行仅是近百余年的事，其内涵也已不再是直接式的民主，而是代议制民主，英美的学者则更愿意称后者为共和。他们强调在政治过程中，既要有反映多数人意见的机制（如普选制），也要有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制度（如司法审查制）。也就是说在整个政体的安排中，各种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表达途径，从这个视角来看，民主总是处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任”，所以人民将权力委托给了国家，希望管理者能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信任”，所以需要有权力之间的监督机制，多数人的利益表达机制、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央的利益表达机制、地方的利益表达机制，等等。这些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成为民主的均衡和公共政策形成的基础。或许这正是共和的真正意蕴：分权、合作、制衡、共赢。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的宪政民主、社会民主及党内民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就宪政民主而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就社会民主而言，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的发展都足以作为例证。而就党内民主而言，各级党的领导问责制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做述职性工作报告等举措都在向世人昭示中国实行民主的决心。近代中国革命是以倡扬民主与科学为序曲的，根据这种“路径依赖”，国人总是认为只要实现民主就等于实现了一切，兴奋之余总是不能思辨式地思考民主的正确内涵。而这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以民主的两个层面来分析我国民主的具体运作情况。

在我国，民主更多地被放置于信任的层面，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实践也多是在这方面下功夫的，如扩大选举范围，改革选举方式，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权威性与代表性，提高各级人大代表素质与回应性，等等。这方面我们确实需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基于信任，我们要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能够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基于信任，我们要使代表成为精英从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巨

大的作用……这些都需要机制的构建,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目前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加大了力度。特别是通过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式,已经引起了许多西方媒体与学者的高度关注。总之,信任式的民主可谓长路漫漫,征程不断。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民主寄予了厚望,希望出现民主的奇迹。但我们不要忘了,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不信任。在西方,随着民主实践的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反思精英式民主的不足,并注意关切少数人的利益。学者们指出民主并非简单地定义为一致性,它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需要的是对话、谈判、协商。普选制可以解决多数人利益表达的对话机制,但并非十全十美,如何体现少数人的利益、怎样实现局部利益呢?从一些宪政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地方分权制度显然有利于解决这种对话危机。在中国还缺乏一种好的、有利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对民主的不信任层面关注太少,以为民主仅仅是统一式的、多数同意式的,以为少数人就代表着被统治,代表着错误,而实质上民主更需要对话,需要全体人民的对话。不信任式的民主事实上就是多元权力主体、结构并存的代名词。

代议制政府的民意机关在理论上应由人民

选举产生,并且受人民的监督,但代表具有独立性,其意志也不能就简单地说是代表了人民。因此,真正的民主不仅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更应该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美国宪法学家约翰·哈特·伊利说政治的“失灵发生在政治程序不值得信赖时,往往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在任者堵塞了政治变革的渠道以保证他们继续在任,未当选者继续落选;另一种是尽管没有人真正忽视一种意见或一个投票权,但一个有影响的多数支持的代表会有计划地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应特别注意解决由不信任而产生的争议问题,要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要切实保护少数群体、局部的利益。

民主并不神秘,也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整套能够为国家带来良好治理的制度实践,如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等人指出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选择决策者并制约其过分行为的手段”。因此,民主并不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或许除了民主之外,我们还有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等价值因素。切不可偏概全,不及其余,而此种理念曾经左右着国人的思维与行动。

(转自《学习时报》第262期)

西安古城墙

● 王星魁

由西安老城市中心偏南的钟楼向南约二里许,即为西安古城墙南门。南门建筑宏伟,属双瓮三门结构,有登临处。登临城墙,你会发现外国游客比中国游客还多。西安(古称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大都会。外国游客多是慕名而来,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也是首选西安。西安城墙上设有自行车租赁站,单人、双人或三人联动车皆有,游客可任选一种沿城墙顶骑车兜风,也可乘电瓶车游览观光。城门楼无比高大,其上有书画展览,需再次买票方可登临。也许是为了限制人数,保护木结构而采取的措施。城门楼因建在12米高的城墙上层层拔高,视野逐渐开阔,环顾四周,俯视下界,街市楼宇,由大变小,宛如沙盘牙雕,行人如蚁,车流如虫,十分有趣。

西安现城墙,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1378),是在隋唐皇城基础上扩建而成,距今已有600余年。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方形,周长为13.70公里。城墙上设有城楼、箭楼、望敌楼100余座,分设在各门或城角,多以城门对称排列,十分威武壮观。城墙上设有垛口5984个,呈内宽外窄的斜口,便于观敌射箭。城外有护城河,水深数米,宽约10米,古时四门有吊桥,可通可断,机动灵活,便于御敌。

西安城墙是目前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为研究古代城建技术和城市防御工程提供了实证资料。

现在古城墙四周护城河两岸,已开辟为环城公园,花木扶疏,碧草如茵,桥涵码头,曲径勾连,游船亭榭,点缀其间,正吸引着大批游客在绿荫中游玩……一派和平景象,无人再理会古代战争的肃杀、攻伐和呼号。

城墙外的高楼大厦在不断地向外延伸,城墙内的老城区,也已楼宇林立,与古建筑的保护区呈插花并存,相映成趣,成为新老西安古今共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陕北革命根据地走来的郭洪涛

● 文安生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立志革命和狱中斗争

郭洪涛考入榆林中学时,校长是著名的西北民主革命人士杜斌丞。当时学校已经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郭洪涛受到很深的影响,不但立志革命,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还根据党的决定,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担任榆林国民党县党部委员。1926年9月,他接任了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成为组织领导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骨干。他们在街头讲演,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游行请愿,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拥护北伐,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的斗争,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逼迫作恶多端的横山县长下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洪涛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榆林转赴太原。他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天,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太原被反动政府逮捕,时年18岁。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和同志们安全。

在5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中,郭洪涛勇敢地坚持斗争。为了改变狱中残酷的监管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和几位党员发动难友开展请愿和绝食活动,同伪监狱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当绝食第五天,许多人饿晕了仍不进食的消息被《大公报》披露后,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从此,伙食有了改善,也可以和亲友通信及定期见面了。

1931年,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人以探视为名到狱中同郭洪涛接上关系后,又指示成立狱中支部,指定他担任支书。支部组织领导了狱中斗争,要求党员立场坚定,对动摇分子进行教育帮助,对有反动言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学习从狱外偷送来的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郭洪涛还在难友中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支部注意团结教育普通犯,做了许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结果有的看守人员能够帮助从狱外带来进步书刊,特许监外的地下党员同狱中党员见面,甚至党员能在囚室里开支部会,个别看守人员则利用站岗的机会为他们放风。在接到特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后,支委会曾具体研究和积极准备发动越狱暴动,联系了300多名普通犯,预定要配合特委正在组织的兵变,届时将里应外合,夺取看守的枪支举行暴动。

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3年郭洪涛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来到北平休养。不久,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正在北方搞兵运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作

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开展工作。一天,谢子长和阎红彦一起到北平沙滩蓬莱旅馆看望郭洪涛,他们在介绍陕西情况时说,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北革命受到了挫折。谢子长说:“我们得回去收拾这个局面,我想让你也一道回去。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咱们同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革命之火熄灭掉。”郭洪涛颇受感动,欣然同意。

12月初,谢子长返回陕北。郭洪涛随后到达陕北佳县,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在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郭洪涛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郭洪涛领导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五支队。游击队在打击和消灭白军民团武装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对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则坚决镇压,并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郭洪涛有一次路过绥德,听到群众议论说,陕北出了个姓苏的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到处为民除害,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郭洪涛感到无比欣慰,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在他看来,这就是老百姓对红军游击队的最高奖赏。

陕北红军游击队很快在绥、米、佳、吴边和绥、清、延川边发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和基层政权,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郭洪涛任政委。他与总指挥谢子长一道率部攻进安定县城,从狱中救出了被捕同志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大大振奋

了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随后指挥所属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三团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除神府苏区外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红军一、二、三团作为主力团,并经郭洪涛建议,中央驻北方代表批准,于1935年1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该师组建后三战三捷,取得了反二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1934年9月,郭洪涛到清涧县进行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按照试点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政策。经过一个冬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根据谢子长、刘志丹共同商定的意见,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两个地区的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并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部署。郭洪涛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努力。

迎接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7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为



1935年5月,中共西北工委的同志与红26军、红27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第二排左起:郭洪涛、李仲英、李宗贵、吴岱峰、高长久、高朗亭、白治民、史秀云

中央代表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派聂洪钧参加中央代表团。朱、聂二人到陕北后,全面领导西北苏区党政军各项工作。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包括陕甘边)发生了错误肃反事件。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以屈打成招的口供为依据,逮捕了红军和苏区领导人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前方还错杀了一些同志。在军事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中央代表团决定成立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军团长、刘志丹副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领导下,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在榆林战斗中歼敌一〇七师四个营。这时,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消息传来,几位领导人就研究过如何迎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榆林桥战斗获胜当天,确悉中央红军已到达吴起镇,经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商定,由程、郭前去迎接。同时报告了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当即派人中央和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郭洪涛和程子华从稻左堡出发,策马扬鞭,当天就到了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中央红军派来寻找陕北红军的贾拓夫。当李维汉和中央机关也到达下寺湾后,郭洪涛向李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两支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正在进行的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还在被关押等情况,并陈述了对肃反扩大化的看法。李维汉感到情况重要,即于11月2日带郭、程去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汇报,对陕北和红十五军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毛泽东愤怒地谴责逮捕刘志丹等的机会主义错误,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据郭洪涛回忆,当时的陕北根据地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24日又追击歼敌一〇六师1个团于黑水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

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出发点。到下寺湾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向毛泽东、张闻天汇报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也就成为郭洪涛革命生涯中一个独特的亮点,成为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光荣经历。

郭洪涛和贾拓夫一起从下寺湾回到当时陕北苏区的中心安定(现子长县)县城瓦窑堡,进行接待中央入城的准备工作。11月7日,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受到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街道两侧红旗招展,欢迎标语随处可见,在高昂的锣鼓唢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送水端茶,中央领导和指战员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郭洪涛为中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准备了一餐尽可能丰盛的饭菜。当领导同志品尝到打土豪的胜利品、陕北罕见的海参、鱿鱼等佳肴时,称赞说,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长征打下遵义时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席间人们谈笑风生,意气盎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得知王稼祥在长征中负了伤,仍身体虚弱后,郭洪涛专门找来一头奶牛,使他每天能喝上牛奶。

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

迎来中央以后,郭洪涛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陕西省委书记。作为地方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央负责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军委代表是张云逸)。1935年11月13日,郭洪涛参加了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了工作汇报。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郭洪涛积极组织为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给养和御寒服装,改善红军生活条件。根据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节衣缩食,仅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就完成军粮970余担,而延川一县提供的军服就多达3000套。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壮大红军力量,中央陆续将西北根据地内的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

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和两个独立师。在周恩来、李维汉领导下,指定郭洪涛负责发动群众参军,在陕北各地迅速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热潮。1936年短短几个月就扩大红军9600人。同时,加强了对俘虏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参加红军,争取改造了3000名东北军俘虏,扩大了兵源。

在张闻天领导下,郭洪涛参加了改变富农政策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郭洪涛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十分重视。经过认真讨论,做出了纠正“左”倾的富农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郭洪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会议,致力于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相继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7年5月,郭洪涛参加了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终生不忘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

陕北错误肃反(包括陕甘边)发生在1935年秋,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郭洪涛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1942年12月,西北局书记高岗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结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说:郭洪涛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同志杀了,好当西北领袖;朱理治同志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洪涛想当土皇帝;郭洪涛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等等。1942年12月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也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郭洪涛当时即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弼时提出申诉,最后他表示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保留个人意见。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郭洪涛所在支部审查这个问题时,根据有关文字证明材料和郭的申诉,提出重新为郭做结论,后因高岗极力反对而未果。但支部书记陈奇涵以党小组的

名义重新为郭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审查意见,并写明应把有关材料“反映上报,以便对郭复查时,作为参考”。

这以后,郭洪涛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操和胸怀。他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在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自慰的。”

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阴谋被中央揭露后,1935年中央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的成员王首道于1956年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我是负责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的,知道郭洪涛不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而是反对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是不对的。建议中央重新审查。”

刘少奇表示: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对的,可以重新审查。邓小平同志致函王首道和郭洪涛,说中央同意重新审查郭的几个历史问题,要郭将有关材料直接送中央监委。于是郭洪涛提出了书面申诉。

1957年6月,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负责这项审查的委员会。中央监委根据反复调查核实的情况和审查委员会会议所作的结论,于1959年11月23日提出《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60年4月,党中央正式批准。

从此,郭洪涛背了17年的莫须有的罪名,终于被历史事实和中央所否定,郭洪涛如释重负。

中央监委《审查意见》指出:“一、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这一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陕北军委会主席。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主持人,没有诬害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郭说过‘杀了

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中央到达陕北不久,郭也向当时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根据以上情况,郭洪涛同志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二、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三、罗荣桓等同志证实湖西肃反主要是由于湖边地委和区党委一些负责干部轻信了个别坏人的挑拨和采用了错误的逼供信方法造成的,并不是郭洪涛同志对本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都应该修改。”

但是,中央重新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下发,更没有公开,而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的注释中仍留传下来“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的表述。“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群众组织认为这是郭洪涛的“罪行”,穷追不舍。郭只好向中央求救,直到《毛选》编委会批复说:“那条注释需要修改。郭提出修改,并不

是错误。”之后,追讨方告结束。1991年6月《毛选》出版第二版时,终于对那条注释做了修改,并删除了个人的名字。

使郭洪涛深为感动的是,1978年12月21日,中央组织部将1960年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的那个《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全国各省、部级组织部门。1983年中央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文件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对陕北肃反问题的有关表述,都继续肯定了1960年中央对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的精神。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这是我获得奉献余生、安度晚年的最大欣慰,我感激伟大的党。”同时,他一再表示:在陕北肃反中我盲目拥护王明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我做过多自我检讨。迄今每当提出或想起这个错误,内心深感愧疚。我将永志不忘,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山东党组织在多处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抗战形势很好,急需增加军政干部。1938年4月,中央同意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提出的派干部去山东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请求。决定派郭洪涛和罗炳辉(后改为张经武)到山东省委工作。同时,选拔了包括段君毅、霍士廉等同志在内的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去山东。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干部,要求他们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坚持平原战争的经验。刘少奇指示郭洪涛、霍士廉,在山东要重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国民党及开明人士建立共同抗日的根据地。

郭洪涛到任后,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他主持召开省委干部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了创立沂蒙、淄博、抱犊崮山区、大泽山、清河地区、沿海地区、梁山泊和微山湖等几个根据地,报请党中央审批。毛泽东电复:“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照此去做。”

在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央决定重组山东省委,郭洪涛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后来



1991年郭洪涛在莱芜徂徕山起义纪念碑前与夫人合影

先后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及中央山东分局(郭均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在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同时,1938年12月成立了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力达24000人。郭洪涛认为,山东八路军游击支队的产生发展,不同于华北各省八路军游击支队和华东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产生发展。那里的游击支队,一般是在正规的部队,或由它派遣的远征支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山东的游击支队并没有正规部队的直接帮助,只是靠着正规八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和当地的群众领袖以及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过程要更困难些。但是,由于山东民众具有反帝反日的斗争传统,有顽强的民族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而且民间枪支极多。所以,不管如何困难,终于日益壮大起来,并且向着正规军的方向前进。这支部队经常袭击敌人,消灭日伪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仅从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就作战540余次,毙伤日伪军14000余人,俘虏16000余人;缴获机枪60余挺,迫击炮12门,步枪1700余支,电台7部;击毁敌机7架,汽车170余辆,火车机车18台,击伤敌舰一艘。

郭洪涛多次同各抗日党派、军队的头面人物会谈,争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孤立顽固派、打击投降派的斗争,争取大批爱国人士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还领导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党校和《大众日报》,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扩大了抗日宣传。1939年,山东分局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2万余人对鲁中根据地的“大扫荡”,建立了32个县民主政权。

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入北平

1949年3月,郭洪涛有幸参与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的工作。1935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作为落脚点,郭洪涛曾骑马到下寺湾迎接毛主席,在瓦窑堡欢迎中央进驻。这次是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党中央、毛主席进驻文化名城北平,郭洪涛乘火车前往高碑店迎接。

郭洪涛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延安整风

和七大以后转赴东北工作,先后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等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工作。北平解放后,郭洪涛任天津铁路局局长,负责接收平津一带的铁路,领导修复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恢复运输,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途中,由高碑店到西郊清华园乘火车。郭洪涛领导的铁路局接受的任务是,要保证铁路畅通无阻,不发生任何问题。当时政治情况复杂,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失败,正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沿途一定要采取万无一失的妥善措施,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

按照周密细致的预定方案做好准备后,3月25日上午,激情满怀的郭洪涛早早来到高碑店迎候。中央领导同志的车队到了,神采奕奕的毛主席一眼看到郭洪涛,微笑着和他握手。看着他身穿皮大衣、头戴旧水獭皮帽,风趣地说:“你这个‘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刘少奇一边握手一边向他介绍了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打了招呼便详细询问列车安排情况,听到郭的汇报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中央感谢你们!”谈笑风生的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王稼祥等同志也一一同郭洪涛握手致意。

列车启动后,郭洪涛坐在第一趟列车上,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前方,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第二趟列车和警卫人员乘坐的第三趟列车开道。列车一路疾驶,全线绿灯放行,很快到了清华园站。中央领导人和铁路局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告别,并要他们向广大铁路员工转达谢意。这一天,又成为郭洪涛革命旅程中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呕心沥血办交通

1952年初,郭洪涛任铁道部副部长,1954年冬改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中央制定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政策时,听取了国务院各主管办公室和34个部委的汇报。郭洪涛和六办主任王首道一起,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方面的形势和发展规划,提出了五项政策措施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汇报内容基本上被中央采纳。1958年至1982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和迫害

以外,郭洪涛一直在国家经委担任领导职务,分管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务和能源生产工作,制订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协助经委主任处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以及调研和总结实践经验。

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郭洪涛还圆满地完成了中央领导交办的紧急任务。这里仅举一例。

1958年,“大跃进”造成交通运输紧张,南方煤炭供应成了大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在南方生产煤炭。可是,一座煤矿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建不起来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铁路主要干线的通过能力。当年11月上旬,郭洪涛出差正在南京。周恩来派他的秘书李岩坐着伊尔军用运输机去南京找他,要他调查研究如何加大京汉、京沪铁路的运输量。郭和李岩马上在南京召开会议研究京沪铁路的问题。然后,坐上军用飞机到汉口、郑州研究了京汉铁路的问题。11月19日上午10时,郭、李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刚刚降落,就有汽车等着,遵照周总理的安排,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当时,总理正在主持国务院会议。郭洪涛作了汇报:根据现状,再增加运输量已不可能,需要采取技术改造措施。一是有些区段增加双线,将来需要时全线改造成双线。这时总理指示:“其他干线运输通不过时,也可以先搞部分双线,再搞全部双线。”二是股道由650米延长为850米,可以多拉车皮。三是增加直达列车,减少中间卸车。四是在煤矿继续推广土法滑溜化装车,提高效率,加速车辆周转。五是开行合并列车的经验可以推广。周总理同意这些意见,由国家经委和铁道部组织实施。此后运输情况,经委指定郭每半月向总理作口头汇报,每个月写成简报。

永葆革命青春

郭洪涛从“一线”退下来后,继续满腔热情地为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1982年,根据国务院决定,组建了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郭担任主任,致力于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建设与发展。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能源基地开发规划和方针政策,并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更为可贵的是,郭洪涛在古稀之年,根据国家经委的决定,组建并主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8年。协会主要是促进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与信息传控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和交流经验。

作为会长,他在历届理事会会议和重要会议上,多次发表主题讲话和政策建议。这些讲话和建议,经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后,均上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对发展运输与通信事业的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协会在各主流媒体发表的重要文章,以及先后创办的《中国交通年鉴》和《中国航务周刊》,深受各界欢迎和好评。

为考察借鉴发达国家铁路电气化、老港口和老铁路技术改造、水陆空联合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等方面的经验,以及重载列车铁路的技术问题,郭洪涛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率团出访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他还接待过许多国家交通界人士的来访,大力支持协会的外事活动,使协会成为沟通非官方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郭洪涛领导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为政府、为社会、为行业、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在努力发挥桥梁、纽带、参谋、咨询作用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服务工作,对促进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 and 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他在90高龄时辞去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人们称赞郭洪涛为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郭洪涛被我国交通界誉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2004年3月25日,遵照郭洪涛的临终嘱咐,他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直接火化,只有几十位闻讯赶来的他的至亲密友、身边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在医院为他送行。在《郭洪涛同志生平》中写道:“郭洪涛同志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是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他“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力求与时俱进,永葆革命青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崇高品德和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责任编辑 萧 徐)

百岁学者谈启蒙

——访夏征农同志

● 李维民

出生于1904年1月31日的著名学者夏征农，今年已超过一百周岁。他是1979、1989、1999年相继三次出版、发行600多万部的《辞海》的主编。2002年又以99岁高龄出任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大辞海》的主编，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在我国健在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他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曾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夏征农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早在小学时期就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复旦大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20年前，我整理父亲李竹如的遗稿时，发现由蔡元培题写报头、我父亲主编的《文化报》1937年6月7日一期上，载有署名夏征农的题为《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文，

同期报纸还有夏征农《野火集》的介绍。不久前我去上海时，把这期报纸的复印件送给夏老。我走进夏老家中时，他正扶着楼梯栏杆从楼上走下来，精神矍铄，不像是年逾百岁的老人。看到当年的《文化报》，夏老说，《野火集》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但由于“七·七”事变很快爆发，未能保存下来。他回忆起当年与艾思奇等在上海创办流动图书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接着又谈到抗战时在新四军、解放后在山东工作的情况，头脑非常清楚，记忆力很好。

夏老就“新启蒙运动”这个话题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是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抗



作者访问夏征农同志(右)(2004年)(陈进鹏摄)

日战争前夕,是又一次启蒙运动,当时叫新启蒙运动,就是启发人民群众发扬民主精神,反对独裁统治,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7年夏老在《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文中提出:“五四时代的反旧礼教是一般的,……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算清它的每一根骨骼,要从它的内部揭发出它的罪恶,要从每一点,每一具体问题,分别举出它在目前的实际作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可虑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提出了口号,而不付与具体的内容,虽然已经指出了新的路向,而不能坚决执行,我希望全国文化人来为这一运动斗争。”

68年前夏老写的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年前夏老跟我说:“启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说现在已经完成了。”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又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倡民主与法制,不再用群众运动的方法,不是个人说了算,而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夏老接着说:“列宁讲过,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命推翻旧政权,但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从而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搞两个文明建设。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都是为了不断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实行和平发展的方针,不是你搞我,我搞你,而是争取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发展。”

夏老曾六次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八大正式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特邀代表。2002年,他以99岁高龄进京参加党的十六大,在小组发言时他慷慨赋诗一首:“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多年来,夏老除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上海社科联主席,上海文联主

席,而主要精力则倾注于主编《辞海》。《辞海》是向广大读者普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也可以说是一件启蒙的工作。夏老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辞海》主编,这年他已74岁,与明朝39岁的解缙编纂《永乐大典》、清朝49岁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相比,可说是前无古人。《辞海》于1936年初版于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出过一次分卷未定稿。夏老主编《辞海》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解放后的第一部《辞海》。夏老说:“我们开始遇到很多难题,曾派罗竹风同志去北京请示,有些问题当时也得不到明确答复,但时间又很紧,要求在国庆节前出书,所以第一次出版的《辞海》中,还有些‘左’的影响。1989年第二次出版,有些问题就能讲清楚了。例如,对一些人物的评价,我坚持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有人提出把活着的人也收进去,我没有同意,因为有的人还会变化。”

1999年版《辞海》,在夏老主持下,从内容到形式又有很大改进,许多条目作了更恰如其分的修改,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纠正差错,弥补缺漏,精简少量词目和释文,并新增彩图,配置16000余幅图片,版式也有革新,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称赞。夏老说:“现在的《辞海》主要对象是广大读者,有些很生僻的字词没有收入,难以满足一些专业工作者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决定编辑《大辞海》,《大辞海》的篇幅将是《辞海》的2.5倍,从去年开始分卷出版。”

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去年是夏老的百年诞辰。人们隆重为他祝寿,夏老赋诗一首,题为《百岁乐怀》:“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篇章就是《大辞海》。夏老亲笔题写的这首诗,笔锋苍劲有力,刊印在去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夏征农文集》书函上。这部文集分为理论与实践,文艺与大众,小说、游记、戏剧、诗歌、词曲及杂文五个部分。收录作品390余篇,共145万字,集中了夏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

(责任编辑 杜晋)

白桦关注右派分子

● 于俊沂

1957年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号召，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时间不久，风云突变，转入了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被列为重点。不足百人的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就有包括笔者在内10人忽坠千罗网，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外，还有8人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降级等不同性质的处分，也有人称他们为“中右”或“内定右派”。这个单位可以说得上是“重灾区”。当时，我在宣传部任党刊《支部生活》编辑。白桦（1920—1993年）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业务；部长由市委文教书记兼任，统揽全局；另一名副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直接具体部署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市委宣传部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白桦不是主要责任者，但他在反右派之后，对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者的命运和前途，却牵肠挂肚，排除各种阻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当年，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对于“右派分子”往往采取以下两种态度：一是视“右派”为“鬼神”而远之，尽量回避；二是雪上加霜，宁“左”勿“右”。白桦却不是这样。

1958年秋，我正在天津西郊区劳动改造，有事需要回原机关办理。考虑到个人的“右派”身份，暗暗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见到熟人躲着走，躲不开就低头而过。既不让人家为难，也不自找没趣。但在楼道里还是遇上了白桦。他主动喊我：“老于啊！”并让我到办公室坐下。我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没脸见领导。”他的心情显得很沉重，亲切地对我说：“不要那么想，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由于我领导得不好，你们犯了错误，

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看来他是有难言之隐的。反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能拒不执行吗？同时他还鼓励我好好改造，不要悲观失望，将来会有前途的。话虽不多，却暖人心田，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好像未经“转世”又由“鬼”变成了人。

1960年，白桦晋升为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任宣传部长。在他的关怀下，到了1962年，我们这些“右派”先后“摘帽”，离开了劳改场地。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少企业“下马”，机关也在精简，就业之难不言而喻。但经过白桦的努力，按照国家规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这与其他某些单位相比，我们算幸运多了。据我所知，市委有的部门就有人“戴帽”劳改二十年，直到1978年中央下达通知后才告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地伤害了大量无辜。1962年初，白桦得到了一个信息：反右派斗争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当加以甄别平反。他认为市委宣传部也存在这种情况，立即指示干部处做好甄别平反的准备工作，一旦中央文件下达，就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以免拖延时间，因形势变化而误事。果然不出所料，此后不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明确“右派无反可平”。甄别平反的事就只好作罢了。

1964年初，我被安排到天津市电影公司工作。白桦的秘书张宝珍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张小纸条，就让我去报到。我说：“是否写一份正式公函？”他说：“用不着，白桦已经同他们谈好了。”

我到了该公司,按常规也就是在人事科办个手续了事。但出人意料的是,惊动了党政所有领导,受到了以刘德经理为首的4位负责的共同接待和欢迎。这显然是出于对白桦的尊重,我是沾了光的。扪心自问,我才值几个大钱!行政21级的最小科员,“摘帽右派”。但领导信任,不受歧视。有些重要工作写年度工作总结、典型经验和带领影院经理去外省市学习等,都放手让我去干。评比先进也有我。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我也作为一名队员参加。由于受到如此厚爱,那几年我的工作比较顺利,心情也舒畅。

应该肯定,白桦这样对待我和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是,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此前一年白桦兼任副市长),白桦受到的冲击,在市委领导干部中居首位,挨斗次数最多,历时最长。其中有两大“罪状”,都与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有牵连。一是“造反派”们从干部处的档案中,发现了1962年准备给“右派”平反的材料。据此加以无限“上纲”,指控白桦为“牛鬼蛇神”翻案。从法律角度看,这条“罪状”根本不能成立。因为甄别平反这只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事实。而法律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二是文化局一名副局长揭发:“白

桦重用右派,在文化局系统安排了8个人。”同时还引用白桦的原话:“这不是卸包袱给你们,我们那些在工作上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事实是那8个人中有6人是“摘帽右派”,另外2人根本未“戴帽”,给予安排工作完全符合政策规定。原来是局处级职务的都当上了一般科员。上述两大“罪状”互相呼应,白桦因此受过多少次批斗,就无法统计了。我在电影公司算是“平安无事”,但随着白桦被打倒和“支左”部队的介入,我和其他许多一道被下放到天津自行车厂当了工人。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落实政策的步伐加快,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解决。我认为1957年给我定的“右派”也属错案,准备申诉。找谁去谈呢?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已由“支左”部队代替,我连大门都进不去。那时白桦已由“五七干校”调回,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我也只好找他了。在院内相遇,他仍和往常一样对人那样热情。曾几何时,原来满头的黑发已经白了许多。可以看得出“文革”期间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到了办公室,他首先倒了一杯水送到我面前。昔日的阶下囚如今成为座上客,我受宠若惊,但不能忘乎所以。水我一口未喝,却觉得全身暖烘烘的。他听完我的陈述后,坦率地说:“俊沂

啊!(这比直接叫我的名字显得亲切)你的问题有重新处理的可能,如果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我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的。”

1978年夏,我写了一份申诉书,寄给了市委政法书记谷云亭。以后不久,白桦恢复原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他得知上述情况之后,十分关注。由于当时正忙于解决“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1957年的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指示办公室先给我写封回信,告知“来信已收到,欢迎你有时间到部里来玩。”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有两句



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话的回信极为平常。但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这信的“含金量”是不可低估的。它表明白桦已经把我看作是自己的了。因此,这件事也轰动了我在的车间。有的人说:“市委给你来信了,这可不是简单事,你的问题解决有希望了。”我也从中预感到了“否极泰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但也不敢高兴的太早了,因为那时党的路线是“抓纲(阶级斗争)治国”,千万不能给白桦添乱。如果再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要闯大祸的,只好“守口如瓶”。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政治路线,明确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有了这“尚方宝剑”,白桦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迅速解决了我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问题。1979年春节前夕,我上班后自行车厂人事科长通知我:“昨天夜间11点半钟,市委宣传部来通知,你的问题解决了。”随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难友,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都得到改正。二十一年来,大家才算真正过上了一次欢乐的春节。

一件错案的改正,三更半夜下达通知,真是罕见。这样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又是出自哪位的“杰作”呢?想来想去,非白桦莫属。后来果然得到了证实。1979年春节过后,宣传部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我们全体被“改正”者出席。内容实际上就是赔礼道歉,只不过没有挑明而已。当时白桦正在参加市委的一次重要会议,不得脱身,由那位当年具体指挥反右派斗争的副部长主

持。但他没有表示歉意,大家也就只好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快到下班的时候,白桦赶来了。他同每个亲切握手,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首先诚恳地说:“由于我领导得不好,让们蒙受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今天特意向大家赔礼道歉!”接着简单地介绍了错案改正的过程。他说:“春节前市委工作特别忙,下班时我对几位副部长说别走了!咱们熬几个夜,让那些受害的过上一个快乐的春节。不论白天或夜间,只要决定了的案件,立即通知到本人或单位。今后应当记取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大家听了上述的几句话,异常感动,痛哭流涕。在改正的通知书上,领导也是勇于承担责任,不留尾巴。通知书是这样写的:“某某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对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现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经领导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恢复政治名誉。”对下属单位,报社、广播、出版和文化等部门,白桦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明确指出:“只要你们决定了的,我们都承认。”这样,宣传系统错划的100多名“右派”,很快全部得到了改正。

在我们蒙冤的漫长岁月中,白桦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犹如严冬里的暖流,灌注全身,使我们减轻了痛苦,增强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勇气和信心,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获得了新生。每当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白桦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于右任的劝戒联

● 季 凉

于右任,陕西人,清光绪年间举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回国创办《民呼报》和《民立报》,宣传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由于他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而遭到追捕。他回到家乡,组织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北伐战争时期,他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于右任无

奈而去台湾,结发妻子和儿女则留在大陆。

于右任到了台湾,无时无刻不思念大陆。随着时光的流逝,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更是年年挥之不去。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和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及大陆在台人员,也都盼望早日到大陆看看,其中尤其是大陆在台人员,他们都怀有回大陆探望故乡和亲友的强烈愿望。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于右任特地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蒋经国。对联写道: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于右任奉劝蒋经国以“天下利”为重,这种思想是很值得赞赏的。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电蒋经国时,亦引用了这副爱国联。

淮海战役中涌现了无数英雄，在我亲身经历的追堵孙良诚部的战斗中，有一位英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为了完成任务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这位英雄却从不为人所知。他就是江淮军区独立团二营六连副连长董继民。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当时我任江淮军区独立团团参谋长兼二营营长。我接受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是堵住孙良诚逃往徐州。

提起孙良诚，淮北人民对他并不陌生。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〇七军军长，驻扎在宿迁。孙号称八个团，实际上经常活动的只有四个团。我们的部队与他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年多前我淮支重返淮北的那天起，孙良诚就不断地纠缠我们。但他既不敢强攻，也不放弃对我们的骚扰和追击。虽说他在我们淮支身上并没占到什么大便宜，但牵制了我们部队不少精力和时间。战士们提起孙良诚的疲劳战术就恨得咬牙切齿，早想与他大干一场。

1948年11月12日早晨，独立团驻扎在睢宁县西南大庄一带待命，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令我率二营轻装急行军奔赴睢宁县城截住正逃往双沟（敌占区）的孙良诚部，要不惜代价完成任务。

二营受命后，早饭未吃完，半小时内就集合队员，副连长董继民同志则带领着六连早已出发了。在不久前的一个战斗中，董继民曾负了伤，此时，刚伤愈归队不久。我们的骑兵侦察员早已驰向睢城方向。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抵达朱集朱楼以南，这时，遇到我团的侦察骑兵报称：孙的先头部队已出了睢城，正沿公路而逃。当时我考虑到在睢城附近截住敌人已经不可能了，便当即命令二营直插大王集方向。从地图上推算，敌我行程差不

多，凭一向有飞毛腿之称的六连必定可以赶上敌人前面，截住逃往双沟的敌人。时间是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

下午3点钟，终于在距敌占区20里处的大小王集，六连追上了敌人，并赶在了敌人之前。大王集西边的一片坟地，中间长着几棵光秃秃的小树，附近还有一条狭窄的小河，地形比较理想。董连长立即指挥战士们构筑工事，挖掩体。阵地靠近公路，必须封锁公路，董连长又迅速安排兵力把公路封锁的严严实实，只等敌人的到来了。

有的战士的掩体还未完成，便发现铺天盖地的敌人大队人马已蜿蜒而至。此时我部队只有六连一个连的兵力，大部队还未赶到，而敌人有一个师和一个军部，整整5800余人。敌人到了大小王集，发现逃跑的道路已被我军封锁，便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自古有“穷寇毋追”之说，可以想象被挡住了逃路的敌人进攻是何等的猛烈。由于敌我兵力极为悬殊，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

身为一连之长的董继民深知肩上的任务重大。由于大部队还未赶到，此地离敌占区只有20里路，稍一松懈，敌人就可能逃掉，完成任务就成泡影，而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时间紧迫，二营能否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就全看六连的了。

在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董继民的左肩，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军衣。为了指挥战斗，他撑持着站起来，一手继续拿枪射向敌人，一边大声喊道：“打！打！”在他的指挥下，全连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对敌射击，把敌人压在公路边的地沟里一时无法前进。急于逃（下转75页）

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

● 朱太刚

执着的探索

——读薛德震《人的哲学论说》

● 汪子嵩

收到薛德震同志的论文集《人的哲学论说》，读后仿佛回到 20 多年前，那时我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当编辑，这本论集中好几篇文章是在我们理论版上发表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论争，薛德震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本书中许多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现在许多人不了解这个背景，先作点简单介绍可能有助于理解本书的内容。

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一些被长期歪曲和颠倒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但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不能碰的禁区，因为当时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人道主义讲的据说是抽象的人性，所以是反动的。社会主义不能讲什么人道主义。虽然经过十年“文革”，任何人都随时可以被侮辱、打骂、迫害以至死亡；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被湮灭；人人心里都在痛恨这种湮灭人道的局面。记得当时有位搞外交工作的同志对我们诉说，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时感到最为尴尬的是：当别国代表大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表示赞同，又实在无法站出来驳斥。薛德震将当时这种情况形容为“谈人色变”，确是史实。正当这时候，我们收到一位哲学家送来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篇文章在 1980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赞许，当时主管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也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被编辑部评成了“1980 年好文章”奖。从此，理论界以为会开放一些了，陆续发表许多讨论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薛德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和《“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都是在这时候较早发表的，他提出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有关人的解放的哲学。‘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等论点。

可是到 1983 年，情况发生了人们没有料到的突变。在那年 3 月 7 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其中主要是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在文革以前，周扬同志是党内文化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前夕，中央发表多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时候，周扬也作过批判人道主义的报告，甚至将苏联在揭露斯大林肃反等问题后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潮，也批判为“修正主义”。但经过“文革”中长期被监禁的痛苦与奇异的生活后，他对自己过去的“左”有了深刻的反思。我记得 1978 年在一次全国性讨论“真理标准”的会上，有人说“真理标准”讨论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周扬同志立即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我们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许多会议上，他公开向当年被整的同志道歉，承担并检讨他自己的错误。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他公开宣布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不断深入探索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所以在这次报告中，他选择了人道主义和异化作为主题。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当时到会的听众，包括许多老干部，都为周扬同志这种爱国爱党、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接着便批判了周扬的这个讲话。周扬被迫检讨，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没有错误，经人劝告要他“顾全大局”后，才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承认“犯了错误”。从此他郁闷在心，病势恶化以至不起。

在此前后，薛德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时，也多次讨论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他指出，“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册中将它界定为：“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由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却被资产者拥有，反过来成为剥削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在政治上，人民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官员，由于掌握了政治权力，便反过来成为人民的主人。宗教上的神本来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反过来人只能低头膜拜。这些就是异化。薛德震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异化劳动论的逻辑的必然的结论。”当时理论界有所谓两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的说法，说异化概念是青年马克思不成熟时期所使用的，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已经抛弃了异化等概念了。为此，薛德震专门写了《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三部巨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其中并没有放弃异化概念；只是在用语的精确性以及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比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所提高和发展，“但在其基本立场和观点，在其精神实质方面则是一脉相承、基本上一致的。”

过了20年以后，现在国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是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话题，这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文明社会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必须与世界相通，不过换了一个概念，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说人是最根本的，是中心。我以为：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其实是同一回事，翻译为英文，同为 Humanism。薛德震在参加“以人为本”的讨论时，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文章《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

章》，发表在2004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原来在1983年批判周扬以后，胡乔木自己要重新做一次理论报告，作为那次批判运动的总结，那就是在1984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在他报告以前，曾将文章原稿在中宣部召开有二三十位学者参加的讨论会，听取意见，薛德震也参加了。他说他在会上提了三点意见：

第一，针对争论初期有人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人道主义，凡讲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胡乔木同志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点他是赞成的。但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在伦理道德意义上说”，这一点却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后来薛德震在198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可以说都浸透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果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幸福的向往、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等等包含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统统从马恩著作中剔除出去，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成什么样子呢？”

第二，会上有个别人提出要埋葬“异化”概念，要为“异化”概念举行葬礼，薛德震据理力争，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异化”概念作过界定。当场有人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49页并宣读了马克思的原话。薛德震还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马、恩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马克思也没有对之作过哲学上的定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们改造自然界，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如：人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不但不为人服务，反而反过来成为制约人、危害人、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怎么能将它埋葬呢？”

第三，薛德震提出：“这场争论是一场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在国内也争论了几十年。在对十年动乱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同志与一批理论工作者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仍然属于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千万不要上政治纲，扣政治帽子。”可惜的是：从那时开始，对于“异化”问题，人们真是“谈

虎色变”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权力异化”，像贪污腐败和特权等行为，触目惊心。这时候，正是特别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作为反腐的理论武器，可是它却被埋葬了，不能用了！今天我们重读当年周扬同志的讲话，真是不胜感慨之至！

现在，“以人为本”已是中共中央的决策，已正式写进中央文件，无论当年对人道主义持赞成的还是反对态度的人，对“以人为本”都异口同声，表示热烈拥护。但是大家对“以人为本”的解读，却还是不同的。2004年5月，薛德震写了《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一文，不同意一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这种理论要将“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区别开来，说：“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客观存在，具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反对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换句话说，它是以社会为本。”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就不应该提“以人为本”，而应该提“以社会为本”，才是马克思主义了。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所讲的“人”，都还是“抽象的人”，属于思想观念；只有“社会”，才是“客观存在”。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以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混淆的产物。薛德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正是在批判了黑格尔、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和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多重规定性的概念，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且是主客体的统一体，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且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类的统一，既是‘我’，又是‘你’和‘他’，而且是你、我、他的统一。”大家知道：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先是认识到一个个现实的人：你、我、他，然后才能概括出来类概念即“人”。如果说“人”是抽象的，不是客观实在，那么“社会”也是从各种现实的社会中抽象出来的类概念，同样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空想的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就是由于它将研究的主体从“抽象的人”变为“现实的人”，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中

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是一个个客观实在的你、我和他；从而才能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

薛德震所批驳的这种论点，其实质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讲“以社会为本”，不能讲“以人为本”。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讲“以人为本”便必然会导致“个人主义”、“以我为本”，以至“天下大乱”了。

社会必然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能单独生存的，必须和别人一起分工合作，形成为社会。所以，个人和社会是一对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矛盾。个人要求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幸福地生活，必须要求社会的和谐和合理；而社会的和谐和合理，又必须能让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和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存在双向的价值追求，个人要求社会满足自己的需要，社会要求每个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受社会规范的约束。

“以人为本”是不是就是“个人主义”？“以人为本”不是说以社会中的某个人为本，而是说要以组成社会的所有的每个个人为本。在我们中国，从历史传统到长期习惯，“个人主义”好像都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但是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一种是：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将“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每个个人认识到自己有争取独立生存、平等发展的自由权利。由此产生的以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为特征的个人主义，英文作 Individualism，它是近现代西方以及一切追求现代文明的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社会准则和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以人为本”也是追求这种理想。而另一种个人主义则是以自我（ego）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文作 egoism 或 egotism，也可译为唯我主义、利己主义或“以我为本”，它当然是任何社会都应坚决反对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而这位论者却将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和后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我为本”等同起来了，难道他是真分不清两种个人主义吗？作为研究“人学”的专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在思想史上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居然混淆不清，实在令人费解！

至于个人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天下大乱”那就要看是哪一种个人主义了。如果是前一种 Individualism, 每个个人都遵循自由平等的原则, 既尊重自己的人格和权利, 也更尊重别人的人格和权利, 社会便会和谐而且合理发展, 决不会天下大乱。而且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立足点, 是一个国家能否立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础。党中央建议经人大表决,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进我国宪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没有每个人的尊严、文明与人格的独立, 哪来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文明与国格的独立? 如果是后一种 egoism,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 尔虞我诈, 以强凌弱, 没有法治, 天下当然不能安宁和稳定了。

讨论中还有人提出, 要用“以公民为本”或“以好人为本”取代“以人为本”。在他们看来, “人”是必须区别为公民和非公民、好人和坏人的, 只有公民和好人才能成为根本, 必须将非公民和坏人排除在外。这是对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严重曲解。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研究和总结了历史经验, 明确提出必须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 其根本和首要的任务便应该是建设。中央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而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便必须照顾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利益的协调均衡发展, 从而使得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和平发展的机会, 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而且稳定。一个执政的党, 不能只对国家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负责, 而是必须对所有的人, 任何一个一个的个人负责。这就是提出“以人为本”的深刻含义, 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伟大理想, 是完全一致的。

为此, 必须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央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就是说, 要根据科学发展的规律, 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去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 必须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 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对于任何人, 不论他是公民还是非公民、穷人还是富人、好人还是坏人, 都必须依法保障他的一切合法利益, 包括尊重他

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即使对于已被判刑的犯人, 无论是政治犯或其他罪犯, 都只能剥夺他依法应该被剥夺的权利, 同时也必须依法保障他其它一切不应被剥夺的权利, 包括依法尊重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这是现代文明国家公认的法律准则, 是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了的, 我们国家是在这样的公约上签了字, 要负责的。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法治观念, 现在也缺少法治教育, 还存在许多法盲是难免的。但只要看到现在媒体上常有报道监狱改进对待犯人的态度, 尊重他们的人权, 以人道主义对待他们, 在这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进, 便可以有所认识。再看到由于美国军人虐待战俘, 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全世界舆论同声谴责, 也可以理解这样的人权问题在世界现代文明社会中, 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里应该看到,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 确实是一项伟大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方针决策。

薛德震同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 经历了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争论, 一直到现在, 又参与了“以人为本”的探讨。可以说, 20多年来, 他真是孜孜不倦地、执著地探索着这个重要的有关人的哲学问题。这本《人的哲学论说》是他取得的第一部研究成果。

关于“以人为本”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 薛德震在书中多有所论及。以上只谈到“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 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 其实与此有关联的问题还有不少, 比如: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是不是“集中是目的, 民主只是手段”? 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是不是能将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可以置之不顾? 等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也是我们为了建设和谐的社会, 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时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 同时不必讳言, 它们也是政治问题、实践问题。正因为是政治问题、实践问题, 更需要大家来共同探讨, 让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发表出来, 公开争辩, 或者去伪存真, 或者求同存异, 以期取得某种共识, 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 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伟大方针, 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上奋勇迈进。

(责任编辑 杜晋)

党史的写法

——读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

● 韩 钢

这个题目,是从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写法》套用过来的。葛著讨论的并不是思想史的写作技巧,而是有关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龚育之同志的《党史札记二集》(以下简称《札记二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党史的理念、视野和方法。这些理念、视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诸文字而浸润在文字之中,是一种“在无画处看出画图,于寻常间显出奇异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书名。

《札记二集》是龚育之同志的第二部党史札记的集子。我是把这部集子(连同他的第一部集子)作为一部党史来读的。在国内,党史著述有通史类、断代类和专题类各种样式,可不可以还有其他的样式,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党史上的学术问题都应当百家争鸣,党史著述的样式不是也可以百花齐放吗?以札记的形式来写党史,就是一种新的党史著述的样式。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同样可以通过札记这种著述样式来阐释、论述和记叙。党史札记陆续发表后,引起党史界内外的关注和好评,比起那些人们熟知的党史著述样式更受读者欢迎。这说明,札记这种新鲜的党史著述的样式得到了社会认可,也说明,党史著述的样式是有创新的空间和必要的。

作者说过,札记这种体裁比较轻便,不拘形式,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引用适当的史料,还可以夹进一些个人亲历亲闻的回忆(《党史札记》书后缀语)。这些长处,是一般的党史著述不大具备的。《札记二集》里的《忆往:读毛与编毛》、《听毛泽东谈哲学》、《一件历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点》、《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

《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读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几篇,都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夹进了作者本人的亲历亲闻;至于有关人物的一些篇目,如《傅鹰老师二三事》、《“故人长忆亦长磋”——悼党史学家郑惠老友》、《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两件事忆沙洪》、《周扬集外集 序》等更是作者的回忆。札记诸篇因此而生动可读,有一种让人不忍释卷的阅读魅力。

话说回来,《札记二集》(连同《党史札记》)的特点,并不只是写了作者本人的亲历亲闻。一个更值得圈点的长处,是这些札记展现出



来的视野。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是党史研究的对象。但仅仅反映这些,并不是对历史全貌的还原,因为历史的外延本来就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单论人物,不少党史著述多注意高层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层次的人物,忽略了经济建设人物、文教科人物。《札记二集》则不然,所写既有高层人物、政治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周扬、李一氓、胡乔木、胡绳,也有其他层次、其他领域的人物,如陈翰笙、秦川、傅鹰、林徽因、郑惠、沙洪、张泽石。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一,但是他们迥异的经历同样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从不同角度折射历史。写这些人物,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著述的内容。这不仅是作者的潜意识,更是作者的自觉。作者认为,写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作者还主张,那些重要的影响大的或者犯过错误或者有过争议的人物,那些在历史上被错杀、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应当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党史研究者应当读、应当写他们各种经历的书(《札记二集》之《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篇)。《札记二集》写出亲历亲闻的历史,是因为作者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是一般党史研究者无法效仿的。但是《札记二集》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对研究者却应该有所启发。

读《札记二集》同读《党史札记》一样,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诸篇札记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与一些读者交流,许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这固然同作者的文字风格有关,但细想,又不只是文字风格使然。作者对党史的研究,始终持论从史出、平和说理的态度或曰方法,全无那种简单从概念、结论出发的强词夺理,全无某些学术权威的盛气凌人。对事件,对人物,这些札记从背景到细节,都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考察,尽可能还原历史,从史实中提炼观点。《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一篇,阐述的是作者的两个观点,全篇用丰富的史料来说话,引文献,引口述,引专著,不足万字的文章有三十二个注释。直到这些札记结集时,作者看到了新材料,还在后记里补充进去。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在党内设立

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来龙和去脉,在八大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背景和由来,特别是了解毛泽东本人同这两件事情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从丰富的史料叙述中,作者所作的理性思考便有了扎实的史实基础。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札记的观点是力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合乎历史实际的(《党史札记》书后缀语)。本着这样的态度或方法,札记的观点就有了说服力,札记自然耐读。

《札记二集》(连同《党史札记》)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历史知识和启示,但并不等于说这些札记的观点就是定论,不能争鸣。作者就说过,札记中的观点,别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是学者的胸怀,学术研究应该形成这样的良性氛围。我也是这样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加上“唯一”二字的问题(《札记二集》之《怎样看待理论创新》篇),札记对史料的考证是准确的,真理标准问题那篇文章的确不是最早提“唯一”二字的,当然也就算不上是理论创造。札记指出,那篇文章振聋发聩的意义,在于它的现实的针对性,政治的和理论的针对性。这个评价是深刻的。不过,尽管不是最早,但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之下,在个人崇拜依旧盛行的情势下,加不加“唯一”二字,意义还是很不一样的。有了“唯一”二字,才突破了本本的标准、“语录”的标准,更加鲜明地强调了实践的标准,表现出理论上的彻底和政治上的勇气。记得我那年进大学,正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方兴未艾,同学之间你争我辩,脸红脖子粗,讨论得最多的还就是“唯一”这两个字。强调那篇文章的现实的针对性、政治的和理论的针对性,同时也肯定加上“唯一”二字的意义(当然不是强调它的理论创新意义),评价是不是更全面一些呢?

近几年,听说不时有人建议龚育之同志写个人的回忆录。我想,那一定会是一部很有分量、耐人寻味的回忆录。但人们读到的,是五年来他陆陆续续发表的党史札记,这些札记有些篇目包含了 he 本人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这是不是他对前述建议的一个回应?不管是不是,读者都一定会期待龚育之同志的像党史札记这样的作品继续问世。毫无疑问,这也是我这个普通党史教研人员的期待。(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

——《中国水力发电史》序言

● 李 锐

《中国水力发电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的组成部分，早在1985年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南宁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就有编纂一部《中国水力发电建设史》的意向，经我建议，做出“开展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工作”的决定。随即成立编委会，编辑出版《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87年创刊，至1997年停刊的十年中，共出版了28期，刊出文章、资料约320万字。此事得到广大水电工作者的支持，特别是老一辈各级领导和专家积极投稿，总结了他们多年来参加水电建设的亲身体会和经验教训，从而抢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这些都为编纂《中国水力发电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部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并分述各专业技术进步的事实，以及各主要水电站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可说内容相当丰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一切从事水电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现在正担负重任的年轻一代，了解和熟知过去的历史，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是必要和有益的。从而更结合实际，引进当今国内外有关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各方面迅速提高原有的水平，并督促国家各有关部门为开发中国的丰富的水能资源，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老一代的希望。

水电是一次能源，如同煤炭、石油一样，但它是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更是毫无污染的清洁能源。此外，水电站所形成的水库多具有防洪、灌溉、航运、供水、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在电网运行中，可以承担调峰、调频等多项任务，有很大的灵活性。中国河流众多，水量充沛，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高山峡谷，落差大而集中，如黄河、

长江干流总落差都是五千多米，水电建设有着天然的优势，造价一般低于世界各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就已查清，中国的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开发条件特别优越。

1912年，在云南昆明市郊螳螂川上建成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但在旧中国，水电曾长期是一个陌生事物。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修建几座装机仅几百千瓦的水电站。日本占领东北时，在松花江、鸭绿江等河流上大规模发展水电，但并没有相应地产生中国的技术力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会议，才为中国水电建设事业揭开了序幕。

1952年秋，我调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50年代和80年代初先后共工作了十一年，是我生平最长的工作岗位，从而同水电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虽身离岗位，但心却仍与水电密切相牵，继续为中国应优先发展水电尽绵薄之力。

当年，燃料工业部有煤炭、电力、石油三个部外的独立总局，水电是部内局；从国家计委到部领导都很不重视水电。同时，水利部专一防洪，大兴水库建设，已开工的官厅和淮河各支流的水库工程，都没有安排电站。经过努力，1953年初，即成立了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这样就便于呼风唤雨了。随后得知苏联专家电力组长曾向部领导警告：鉴于苏联经验，中国不要搞大水电站。经我建议，1954年派电力代表团到苏联考察，部内管电的副部长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在苏联四个月，将他们开发水电的经验教训彻底弄清楚。如伏尔加是平原河流，总落差二百多米，建大水

电站投资特大、工期又长,每年占去一多半电力投资,而投入容量有限。回国后,我作了一个报告,并在《水力发电》发表五万字长文《苏联水力发电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黄河规划结束之后,水利系统也开始接受防洪水库工程应当综合利用的主张。为了便于各地水电的开发,50年代中期,水电总局即在全国成立了八所水电勘测设计院,其中五所在西部,以便西电东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装机66.25万千瓦,不到四年就开始发电,又好、又快、又省,造价同火电相当,水库千岛湖现已成极佳的旅游胜地。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的“辩论”,毛泽东否决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尽快上马的意见,同意我的从长计议;同时,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完全有条件比较快而省建设大中型水电站,于是确定电力工业“水主火辅”的方针。党中央八大一次会议上,电力部刘澜波部长曾谈到“二五”计划后,力争水电比重达到50%。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梦想而已。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我被列入集团成员。随后水电部也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我们被称为“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的“三反分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国水电系统受连累的各级领导和技术骨干不下200人,使水电建设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文革期间水电系统更成为全国最重的受灾户。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当年水电部的负责人,沿袭水利建设的勘测设计分散于施工单位的办法,将水电系统所有勘测、设计、科研单位全部拆散,多所水电学校停办,人员分流,水电总局也被撤消,档案资料烧毁或丢失,只有成都、昆明两所勘设院,由于领导奋力顶住,得以保留。水电建设遭此摧残,元气大伤。1979年1月我回京复职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所有这些机构。这时提出的全国十大水电基地的设想,主要在西部。

到80年代,中央领导都言之凿凿要优先发展水电,但始终未能实现。我介绍过当时的世界形势:根据80年代中期的统计,除14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外,在161个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电力,水电比重达到和仍在90%以上的国家有32个;

水电比重达到和仍在50%以上的国家有112个。这些国家优先开发水电半个世纪左右,已开发水力资源都在40%以上,高者90%。我去过巴西和澳大利亚,都是煤炭出口大国,水电比重:巴西90%,澳大利亚59%。到2002年底,依靠水电提供能源的比重,仍有24个国家在90%以上,55个国家在50%以上,62个国家在40%以上。水电的平均开发度,发达国家已在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都在80%以上。而我国水电资源的开发只有21%。在全国发电量比重中,五十年来水电长期徘徊不前:1950年17%,而2000年也只17.8%,导致此种局面,不能不令人叹息反思。

我们的水能资源和开发条件都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能优先发展水电呢?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当然同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1979年我随能源代表团访问美国,了解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水电的各种优越性易于体现出来:不用烧煤,运行人员很少(为火电的十分之一),成本大大低于火电;在电网运行中,常担任峰荷和调频等,其售价高于火电。因此,水电股票在市场上最稳定,火电却受煤价波动的影响。同火电相比,水电虽然造价高,工期长,但政府和企业都乐于投资。政府对水电还有倾斜政策。水电建设由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占三分之二,还本年限50年,利息比商业银行低。火电建设由政府投资的仅占13%。

我们计划经济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电力部门的利润全部上交,建设资金全靠国家安排。电力、煤炭和交通的基建投资分归各部,火电投资只计电厂本身。水电投资除移民费用外,大部分用在大坝等土建部分,形成水库后的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部门,都不分摊投资。电力投资水、火捆在一起,在供电紧迫的情况下,自然“急功近利”,首先安排短平快的火电项目。其实火电属于能源工业内部的电力产业,需要解决燃料和运输问题。水电则是开发与转换合为一体的能源。因此,在我国最支持水电优先发展的是煤炭部。

第二,宏观决策和具体领导的短视与失误,

这是指国家计划和电力部门领导而言。当年成立水电总局,部内尤其管火电的反对,我只好走上层找陈云解决。刘家峡水电站列入勘测设计计划,部计划司都不同意。上犹江水电站能较早建成,是因为江西没有煤。四川水能资源全国第一,屁股却长期坐在火电上,近年二滩水电站建成,大量电“窝工”送不出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煤炭紧张,竟兴建了635万千瓦的烧油电厂,将584万千瓦烧煤电厂改为烧油,几年之后油价上涨、油源紧张,又全都改回烧煤。这一折腾,损失一千多亿资金,如果早投入水电,至少能建700多万千瓦。电力投资中水电比重逐年下降,从70年代的三分之一降到90年代初的六分之一。火电用煤的急剧增长曾使得煤炭工业难以承受,电厂纷纷被迫停机减产;这种恶性循环更加加剧电力紧张局面。

《电力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水电理应同水利一样属于公益事业,同样享有各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水电火电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不加区别,过去和现在的财税和信贷政策,如进口设备关税、耕地占用税、水资源费、投产后的增值税、信贷还款期、还贷利率等,都极不利于水电开发,造成水电资金难筹,还本付息负担过重。水电的综合效益,世界各国早已遵循工程投资合理分摊的基本原则,如防洪部分资金多由财政直接拨款支付,不需还本付息。我们可怜的水电,却一直被有关部门和电网吃“大锅饭”,不仅所有优越性视而不见,反而长期戴着“投资大、工期长、造价高”三顶大帽子。在宏观决策上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一是我国人均能源相对匮乏,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专家测算年

能源的缺口量,21世纪将超过一亿吨标准煤,以后会逐步增加。二是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问题。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占75%以上,其中火电为烧煤大户,许多大城市酸雨频频发生,据统计每年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尤其同人民的健康直接有关。为这两个问题,也应尽快发展水电。

第三,水利部门难于合作且“乱点鸳鸯”,阻滞了水电的有效开发。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善于开发水利并有治河传统的国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水利部门,由于急着彻底解决大江大河的防洪问题,且以修大水库片面防洪为主导方针,跟水电开发形成许多矛盾。1982年3月,为了水电和水利的顺利发展,我向中央写了一份万言书:《对水利工作的意见》。当时国务院正召集有关部门开水利工作讨论会,我的这份意见书被印发为会议的一号文件。其中主要批评:“三十二年来,水利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根深蒂固。”“1972年12月,在为葛洲坝出问题国务院召开的三次会议上,周总理曾严厉指出,水利工作二十年不愿总结经验,吃了大亏,走了许多弯路。像财政部调查报告中的逆耳之言,我就担心能否听得进去。毛主席的功过和‘左’的思



长江三峡

想都做了总结,难道水利工作就不需要彻底总结一下吗?做好这个总结,也关系到今后水电建设能否加快发展。”然而,积习难改,病灶依然,1998年长江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暴露了水利部门仍在走老路,总是不切实际,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我在《谈1998年长江防洪问题》的长文中谈到:“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大河,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对武汉不起什么作用。”“三峡水库形成后,按175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200亿立方米(这个数目相当于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下泻的流量)。何况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是泥沙淤积对重庆的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水位控制在160米。去年十五大我的书面发言的末尾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部门应当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要接受三门峡教训,水库形成后,可能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要作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水电建设本身开始了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引进竞争机制,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施工方式、内部管理、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开发方式上,也出现了河流梯级滚动统一自主经营的模式。但有关水电建设的全局,从总的规划、勘测设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到具体施工等等,是否缺乏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当前这种比较“分散”的局面,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还需不需要一个统一推进的机构?我就难以置辞了。

我国水电建设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一代代水电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为本身的业务工作来说,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教训。我认为主要经验是,我们一开始就树立了正确的河流规划思想,即利用自然、和谐持续发展,以综合利用原则规划整个流域,确定梯级开发方案,从经济上、技术上充分比较论证,极其慎重地选定第一期工程,这可说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稍有不慎就犯大错误。

另一个根本经验是,十分重视水电建设的前期工作和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在初步设计之前认真收集、分析、研究有关的水文气象、地形,尤其是地质以及有关国民经济等一系列资料,水电系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从50年代初就培养了这种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调查研究作风,但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基建程序遭到严重破坏,工程仓促上马,“三边”影响了工程质量,事故频发,造成一些工程被迫停工、返工浪费,教训是深刻的。三门峡的教训还在于,对黄河泥沙问题的研究和处理措施,存在失误,导致错误的规划指导思想,从而排斥了不应修建的正确意见。葛洲坝等工程这方面的教训很大,也是应引以为戒的。

尽力优先开发水电仍是21世纪我国能源政策中重要的一环。虽然到200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总容量达到8607万千瓦,年发电量2745亿千瓦小时,已名列世界前茅,但我国目前水能源开发程度仅为21%,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西部地区水能资源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开发率却不到10%。新的世纪中,我国电力要求增长速度仍须加快。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要求,根据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规划,水电容量占电力30%计,约需装机3亿千瓦,即20年需新增容量2.17亿千瓦,年均新增1000万千瓦以上。这是摆在全体水电建设者面前的艰巨的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尤有赖于水电的加快建设。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对水电大坝建设的风浪,还组织了一个“国际反坝委员会”(ICALD),指责大坝的危害,关键还在大坝形成后,同生态环境的利弊关系,究竟如何?怎样兴利除弊(或将弊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当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专家和媒体提出许多疑虑和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方面我们需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也需要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对于在建的工程(如三峡),尤应对一切不良后果做出预测和防治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贯彻全面、系统、可持续发展,不贻误我们正当的水电建设事业。

(2003年10月)

小平同志的三点高见

● 杨正彦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至少有三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发展的。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少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长，毕竟对法国的社会有所了解。当他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以及他从“文革”后复出以来，又访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访问过马来西亚、泰国、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所到之处他都“不耻下问”，获得不少第一手材料。平时他又十分注意读海外各类报刊，所以他早在1985年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点。到1987年便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到1992年，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后，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明确提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在这里，小平同志更大胆地提出，像证券、股市这些貌似发达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我们也不妨拿来试试。最后他说道：“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党中央遵从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一步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先后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并行”，

最后提出：“施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有用的东西，还予以保留。

新中国正是走这样一条有创造性的新路，近二三十年才取得经济及社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的以上论断，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发展。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本著作中都曾讲道：在社会发展的三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英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场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无论马、恩、列，都没有论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受历史条件所限制。

邓小平同志活到20世纪90年代，他亲眼目睹了以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为基础原理，发展出的原子弹、氢弹无比巨大的破坏力，更看到由于核技术的和平作用以及计算机、互连网等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带来的变革，所以他于1988年大胆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方针、政策说什么是第一，这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哪项工作排在第一，是可以因时而变的，但在理论上称什么是第一，那可是要有充分的论据，而且要经得住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是绝对不能随便改动的。

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国家以及地方工作就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组。首先就是在用人上，邓小平曾颇有感触地讲道：“只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高科技搞起来。”于是我们党和政府一步步深入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从“老

九不能走”，直到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表彰和奖励自然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以载人的长征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为首的四名最杰出的代表，不但获得最高荣誉，还获得重奖。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教育事业，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靠科学和教育兴国。1985年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讲道：“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话讲得多么好啊！

第三 关于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施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邓小平同志却把它设计出来，并付之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后，这两个特别行政区都搞得不错，小平同志虽然没能在1997年后，到香港去看看，但“一国两制”这一发明，已经为世人承认是成功之举，将来台湾也将照此办理。

据查，香港是英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中强行夺走的，九龙和新界则是1856年和1860年英国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的，租期为99年。1982年9月，小平同志与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外号称铁女人）谈判香港问题。一上来小平同志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关于主权问题，应该明确地确定，1999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

在那次谈判中，撒切尔夫人企图以主权换治权，小平同志讲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得到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上述意见发表时，不仅使国内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士感到吃惊，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感到大

出他们的所料。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共产党怎么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在自己执政的国家合理合法地长期存在和发展呢？然而小平同志就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1982年谈判后不久，中英即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议，并且中国与香港开明人士共同组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香港基本法。1984年，小平同志向香港工商界人士又一次发表重要谈话（后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题，收入《邓选》三卷）。其中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

不久前，中央决定重新发表邓小平同志1984年这篇讲话，除了坚定港人对高度自治下搞好香港的信心外，对什么样的人才是爱国爱港人士明确了其定义。这十分重要。已经连任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董建华先生，生在香港、到英国留过学，又在美国工作过，其弟弟仍在台湾经营一家很大的航运公司，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人物。他就任后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不断鼓励和支持，也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多数官员和广大香港同胞的拥护。因此我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发展，是有根据的。

（责任编辑 杜晋）

敬告读者

因邮寄和装订成本增加，《炎黄春秋》合订本的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04年12月1日起调整的价格为：精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5元；简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0元。2004年合订本于2005年3月制成，价格同上。

敬请读者谅解。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梅兰芳天津滞留记

● 张颂甲

五十五周年国庆节来临前夕,9月21日出版的第779期《作家文摘》刊登了《梅兰芳画传》中有关五十五年前梅兰芳在天津一度“受难”的情况。文中说,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暂演出期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此言一出,立即引来批评声一片……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

此文既出,旧话重提,不禁使我回忆起历历如在目前的往事。

“移步而不换形”提出缘起

1949年夏,北平解放不久,年方22岁,刚从国民党特刑庭草岚监狱出狱不久的我,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访通讯部派我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

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和梅先生寒暄叙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近二百年历史。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

他接着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唱和舞合一,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说,京剧是要改革的,但要改得恰当,改得好。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如在《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

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小小的改动,不过是初步的改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侃侃而谈,使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引起轩然大波被困津门

11月2日当晚,我写出题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经梅先生签字,刊登在次日(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上。

大约过了四五天,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副局长孟波同志把我找到局里。他们

态度严肃地询问我这篇访问记出笼的经过。我不明就里,只能据实以告。阿英同志见我有些惊慌,便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迅速地在北京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在京剧界很有影响的名家认为,梅兰芳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当时写文的有:田汉、马彦祥、马少波、阿甲等)已经写出几篇批判文章,要见之于报端。后来,中央(即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考虑到梅先生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公开点名批评要慎重。于是才把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为此,天津市文化局两位局长才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对此事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承认稿子是我采写的,发表前未请领导审阅是我的疏忽。但对旧剧改革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何致落罪?

我一方面气愤,一方面又感到惶恐。毕竟是自己写的报道出了问题,闯了大祸。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回到报社,赶紧向孟秋江社长和李光诒主任作了汇报。他们安慰我说:“新闻自由嘛,客观报道,记者是没有责任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绪稍微放宽了一些。

话虽如此,我个人承认错误,写检讨,事情不大,而用我的笔给梅先生捅了漏子,于心不安。过了两天,我再次去看望梅先生。

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已从阿英同志处得知这个消息,精神很紧张。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那时,刚刚迎来全国解放,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艺人,对新社会的一切还不适应,思想还来不及转变,遽然受到“点名批判”这样巨大的压力,他怎能承受得了啊!

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



梅兰芳与祖母陈太夫人

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我歉疚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为了解脱您的责任,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是强加给您的,此文与您本无干系。然后,我写个‘检讨’,说自己采访粗枝大叶,随意性强,把不属于梅先生的观点硬加在梅先生头上,文章见报前又没有送给梅先生看过,也没有送请市文化局领导审阅过,其中所有错误,理应由记者负一切责任。”我再三向梅先生说明,这样做,对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影响,能够解除梅先生的烦恼,是我最大的愿望。

梅先生低头不语。此时,许姬传先生忙道:“不妥。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托责任,不虚心接受批评。”他又说:“我倒想出一个办法,由我许某人出面,写篇东西,说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说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写的观点,全是我许某人所谈,如有错误,应由我许某负责,与梅先生无干。你们看这样处理可好?”

梅先生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帖。我也觉得拐这样一个大弯不好。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

梅先生此时在天津已演完戏,本来预定11月10日返沪的,现在被此事拖住,欲走不能。他被困津门,一困就是半个月,迟至11月下旬,还不能脱身。每天无所事事,只能闭门家中坐,听候处置。

座谈会上被迫作自我批判

又过了数日,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传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以慰问。阿英同志说,颂甲写的那篇文章的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先生和许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对梅先生上次发表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借此机会重新修正一下

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全文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向全国有个交待,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二位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解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天津市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

会上,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戏剧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便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先生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的帮助。因为行色匆匆,我只能谈谈最近演出和学习中所得到的点零碎感想。

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最高的统一指挥的文化部戏曲局,也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艺人们自己也在翻身后不断有着进步。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运动是不会不成功的。

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正如何迟同志所说的,是剧本的缺乏。发展的要求是普遍的,由于剧本不够,就使我们的发展受了限制。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者和旧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旧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等的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那根本上不应该再演的就不演,须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先选出还可以演的,还有一部分意义的,把那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

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意见，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后学习的一个进步。

我希望，为着适应目前运动的需要，剧作家、文学家以及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应大胆放手创作新的剧本，以供给全国迫切的需要，使运动很快地展开。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初期虽难免出丑，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达到胜利成功的地步。

座谈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取梅先生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他的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他讲完，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此时，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谢意。

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

座谈会接着进行。对“移步而不换形”观点提出异议的先后有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粹深、著名作家方纪和阿英同志。批评是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气氛中进行的。

华粹深说：“我对于旧剧改革有两点主张。第一，我以为改进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认清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大胆去改革，不必有所顾忌。同时，要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改革，这样自然能够逐渐进步，而获得很大的效果。第二，形式和内容不可孤立，应当同时改进。以旧剧的内容来说，自然大部分是含有封建毒素的，而形式上有问题的也并不多，如果只注意内容，而忽略了形式，也是不对的。”

方纪说：“过去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先于民间，死于庙廊’的。诗歌如此，戏剧也如此；昆曲如此，京剧也如此。皮簧产生以后，首先为人民所喜爱，然后为统治者所采取，便由民间进入庙廊。以后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

都逐渐起了变化，成为脱离群众的东西。拿京剧和梆子来比，梆子音调高亢、节奏响亮，农民很喜欢；京剧在这一方面就不行了。

但京剧自然有它的优异处，如音乐和谐、表现细致等，就都是在宫廷里面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对于艺术形式本身固然提高了，但同时也因之失掉了生命。京剧形式上柔脆硬化的地方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它已不宜于表现新的现实的事物。正如绝句、律诗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 and 情感一样。

因此京剧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限于内容，同时一定及于形式。因为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 and 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 and 感情。特别是在我们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古人的生活 and 感情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京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了。因此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发生变化。有用的留下来，没有用的去掉，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是改革。”

阿英同志就剧艺改革的全面工作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艺人们的思想改造。如果旧艺人 not 进行思想改造，新的剧本的内容将无法正确的掌握，对于人物的性格，总也不会有正确的了解，即使演出新戏，也不会有大的效果。第二，是普及与提高问题。第三，是内容与形式问题。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移步也必然换形。如苏北悲调乐曲无法容纳翻身的快乐情感。第四，是剧院前后台制度的改造问题。如天津各戏院的票房制度不但剥削艺人、剥削后台，也剥削观众。若不解决，整个剧运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座谈会上，还有天津市著名曲艺演员富少舫、评剧演员白云峰和文艺评论家张富忱等人的发言。他们对梅先生多年来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发言说，我相信梅先生一定愿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努力旧剧改革事业。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梅先生的弟子言慧珠也对梅先生表示了敬意。

直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座谈会才结束。梅先生再次站起来，说明他对天津戏剧曲艺改革事业成就的欢喜和敬重。他认为这次座谈对他来说受益良多，他一定根据大家的意见，为戏改事业作出努力。他希望大家明年（指1950年）能在大家

的帮助下,从事新的演出。

“京剧革命”中又成为大毒草

座谈会开过后的次日,即11月28日,梅兰芳和许姬传一行离津。我送梅先生登上去沪的火车。两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为表示我对梅先生的歉意,在《进步日报》记录稿后,我加添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有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对梅先生的这次批评,除天津开了一个会外,媒体未作任何报道。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天津的会上只有三位婉转地提了点意见,几乎是不露声色;梅先生当场“收回成命”,由系铃人自己解铃,无伤大雅。此时,这次风波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事后来再无人提起,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我和梅先生从此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前排看戏。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十七年之后,这件已被人们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众人皆知的那位自封为京剧革命“旗手”的江青,扬言她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地受到阻挠和破坏;她还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反对京剧革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梅兰芳通过张某人的手笔发出的“移步而不换形”论有幸荣登榜首,是为第一株!据说,另两株是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实为彭德怀翻案”论。

此时梅先生已作古,记者尚存;何幸之有,戴此桂冠!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旧(北京)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分指挥部二连的领导向我质询此事,让我将反对江青的事情交代清楚时,我始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继而啼笑皆非,不知所云。所幸,1953年以后,随着《进步日

报》恢复为《大公报》,由综合性报纸改为财经党报,我也转业为财经记者,与文艺界逐渐失去联系,其后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由于我与戏剧绝缘,就无法再罗织其他罪名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首五十五年前的这个风波,对梅先生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全国解放之初,他是满腔热情地拥抱革命,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他不曾想,刚刚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就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这和他的和善、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对照,无疑是极大的反差。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和迷茫,着实愁苦了一阵,让他领教了政治的无情和厉害。

但就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梅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此后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不能不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先生解放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风波以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为,这对京剧改革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

梅先生一生为京剧事业呕心沥血,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出众表演天才,把京剧艺术推向高峰。这样一位京剧大师,提出的改革京剧意见自有其合理性,理应珍视,并很好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即使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理性地进行讨论,决不能动不动就点名批判,说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特别是学术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不能随意扣帽子,以势压人。

这里,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希望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今后不再发生本文所叙述的类似情况。果如是,则艺术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

● 袁伟时

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 20 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 80 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 1987 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为 20、21 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 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 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 WTO 来说,愚意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 WTO 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党政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我们过去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 WTO 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 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

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证,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西方技术之士在中国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七千部西方书籍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

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成百上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有意无意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论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陈寅恪 1940 年在香港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传统文化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

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掇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

笔者断言20、21世纪之交,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标志着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也是指制度文化而言。至于那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这里不存在终结与否的问题;而且有些文化遗产,需要严格保护,根本不存在更新问题。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

跟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在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无论从起源和现状看,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实际。在发达国家,保障多元文化体现着对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往往与民族独立的诉求紧密相连。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正当性。

不过,同任何问题一样,多元文化也有它的特定边界,不必要的超越,可能走向谬误。

第一.进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

后,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大体仅限于非制度文化领域。如果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领域,不适当强调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为抗拒改革的借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目前许多东方国家仍在泥淖中打滚,说到底,就是冲不破传统的桎梏,不愿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制度文化。

第二,不应以多元文化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价值至上。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正是围绕公民个人自由及其保障而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

如果上述两条边界可以接受的话,困扰文化讨论多时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

海内外学术界热衷于从民族传统中寻找自由、民主的传统。有些中国学者进一步冀图证明中国文化有特殊的救世良方,可以治疗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加上有些西方学者推波助澜,对民族性的强调更成为一时风向。

愚意以为,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

1. 东方各国国家独立后,无论经济起飞或者困顿,都会经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现象。只有民主、法治健全和经济彻底融入全球化以后,这种民族狭隘情绪才会逐步消解。

2. 民族文化研究青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19世纪以降中国屡见不鲜的西学中源说和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是其中两大流派。

3. 不能低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新中国宪法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规定为指导思想,我国政府这些年又断然决定参加WTO,而朝野波澜不惊,都证明中国人,从平民到党政领导人,都有宽广的胸怀。那种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不顺利应该归罪于不注意传统的论调,是文人学士不恰当援引洋人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假设后想当然的产物,经不起严格推敲。

4. 中国正处在需要在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经营,从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

教育……各个层面全面输入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警惕别把弘扬民族文化变成构筑民族文化自我封闭的堡垒。

中国文化的改造无法回避

总结19、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一个必须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学术积累不足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往要在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作出自己的选择。走错一步,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自由争辩。

从20世纪之初开始,既缺乏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经验,又没有系统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孙中山就鼓吹“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文化底蕴直接渊源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描绘,加上一个美国三流经济学家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

20世纪一个世界范围的论争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在频频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在前苏联蓄意掩盖真实情况和大肆宣扬计划经济的成就的背景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道路。张君勱、张东荪、马寅初、翁文灏……无一例外!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定不移维护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哈耶克。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的传统。

说到底是中国没有牢固树立公民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从君上等臣民思想却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被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拦腰打断!

广义说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屡扑屡起,但迄今还没有很好的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台湾学界奇才吕士朋

● 马社香

吕士朋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台湾“教育部”表彰的教学特殊优良教授，国际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荣登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英国《国际名人录》的名人，也是一个身世坎坷经历了海峡两岸暴风骤雨的学界名流。

一、靠自学成才的的台大高材生

吕士朋 1928 年出生在大陆文化名城——江苏高邮。曾祖、高祖虽没有秦高邮“织云弄巧、飞星传恨”的文才，却以科举功名做了两代盐官，积累了一些家产。到祖父一代家道渐告中落，父辈时已见穷泊。吕士朋父亲任职高邮督学，不幸吸上鸦片，肺病不治，抛下 5 岁的他和两个哥哥去世。母亲靠娘家陪嫁的一点钱，供养三个孩子苦苦读书。吕士朋小学四年级，七七事变爆发。1938 年日军占领高邮城，母亲带着他和二哥到乡间逃难。逃难途中一有空暇，吕士朋就捧着书读，后插班乡间国小六年级，完成小学教育，自修了初一课程。汪伪政府成立后，母子三人回到高邮城，吕士朋念了两年书。母亲便再也没有力量供吕士朋读高中了。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新，国民政府在沦陷区举办了一次“收复区学生甄别测验”，吕士朋报名参加，得到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同等学力程度的证明。学徒三年，休学一年，吕士朋几乎一天都没有耽误，自修完了整个高中的课程。1946 年春，在哥哥同学的介绍下，吕士朋来到南京附近江浦县高里乡胜利农场当管理员。半年后胜利农场办不下去了。场长遣散了所有的员工，仅留下吕士朋一个人看管场房和粮食，管饭吃但没有薪水。

胜利农场的场长姓顾，他发现吕士朋办事

认真，国文算术样样都拿得出去，就在农场内办了一个类似私塾的“胜利农场附设小学”。那是当地第一所小学，一下子四五十人前来报名，学生程度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都有，吕士朋当年只有 18 岁，毫不畏惧地将他们一个个收下来，分班施教，成效很好。学生家长很感谢，自发地家家拿米给小老师作酬劳，因当时国民党的钞票一天天贬值得太快，米是“硬货币”。吕士朋每月竟有了两担糙米的收入，比北大教授的收入都要高，他便将母亲从生计艰难的大哥那里接了过来。学校越办越好，县政府批准注册为“江浦县立高里乡国民学校”，由乡长兼任校长，县里又派来两位老师，19 岁的吕士朋担任了第一任教导主任。

大陆频频战乱，吕士朋二哥 1946 年去了台湾，在台湾长官公署工矿处任科长。1948 年 4 月吕士朋陪着母亲来到二哥身边，7 月参加了台湾大学和台湾师院的入学考试，均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吕士朋选择了台大历史系，以入学考试成绩优秀，得到奖学金。次年，台湾当局颁布凡是家乡是共产党解放了的学生，一律公费读书。吕士朋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一并解决了，大学的其它费用，他便靠做律师事务所书记和中学代课维持。大学四年，吕士朋没有花家里一分钱，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全系前茅，经常是代表台湾大学“书卷奖”得主，1952 年顺利毕业。

谁知厄运一下子贴在这位一心读书的高材生身上。

二、两次冤狱苦脱身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学生毕业必须接受“军训”一年，尽服务兵的义务。吕士朋在接

受预备军官训练(预官一期)时,队中的指导员,几次劝他加入国民党,都被他婉言拒绝,想不到由此种下祸根。1953年7月吕士朋受训期满,回到母校历史系做助教。不久一个晚上,吕士朋居住的二哥单位宿舍突然被两个台北市调查局人员敲开,没有传票,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将吕士朋带到调查局办公厅,连夜受到“于科长”的审讯。

刚出学校的吕士朋到底犯了什么法呢?原来是受到大学同学的陈良谋“牵连”。陈良谋的“罪行”也是很好笑的。1953年10月,陈良谋任教的中学办壁报为蒋介石祝寿,陈良谋在办公桌上随便把祝寿二字写成“祝兽”,并未粘贴,几天后就被捕了。经疲劳审问和上老虎凳,陈良谋被移到军法处以“叛乱”罪名起诉,罪状是“侮辱元首”、“为匪宣传”等等。在调查局的逼供下,吕士朋“招供”“罪状”:一曾参加1949年3月下旬的一场示威游行,高呼过“反对警察打人”、“打倒官僚作风”;二在宿舍内曾和同学批评过蒋介石总统,骂过孔、宋;三在宿舍内和同学讨论过毛泽东的《沁园春》词;四在图书馆借过《资本论》。仅此而已,吕士朋仍被“留”在了看守所监狱,从单人囚房换到三四人囚房,被允许看书。看守所监狱有个小图书馆,吕士朋在那里认真研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和一些欧美名著,为他以后治学、从事教学领导工作奠定了“修”与“悟”的基础。由此获得了监狱“小博士”的雅号。

吕士朋边读书边坐牢,艰难地度过了360天,最后请了两回户保,才于1954年11月回到了家门。台大历史系不敢继续保持他的工作。吕士朋失业了,只好到中学和大同补习班教课,有幸被凌纯声、郭廷以两位教授力荐提携,1955年4月来到新建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工作。

好事成双,厄运“配对”。吕士朋在近代史所上班4个月,调查局来了两个人找他约谈。其中一人就是上次被抓审问过他的那位于科长。于科长一开口,三言不对,吕士朋又被带到调查局大龙洞看守所“羁留”。这一次吕士朋也是受到大学同学的牵连。这位同学是台大法律系的王东山,和吕士朋一届,大一时两人住同一寝

室,关系较融洽。王东山是个在职生,一直在基隆港务局工作,对停靠在港口的美国军舰看不惯,常在办公室手指窗外,大骂帝国主义。调查局逮捕王东山前进行监控,发现王东山到吕士朋家度了一次周日,说说笑笑地还吃了午饭,扑风捉影把吕士朋划为了同党。

一个月后竟将吕士朋移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

半年过去了,军事检查官才第一次审问吕士朋,很快发现是一起冤狱。5个月后(1956年4月)军法处才发给吕士朋一张“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将他开释,没有一句道歉。王东山左查右查,也没有查出所谓“匪谍”罪行,后来被判“感训”。

手执这份“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吕士朋百感交集,看到处分书上的可疑罪状,更是哭笑不得。调查局把从吕士朋日记中找出的阅读吴晗文章写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字条,作为吕士朋讽刺国民党政府情报工作的嫌疑。简直是新版“草木皆兵”!好在近代史所所长郭教授是个做学问又讲独立人格的人,顶住了一些压力,仍聘吕士朋复职。

多少年后谈到这两次冤狱,吕士朋仍感慨万千地说:“白色恐怖时期,为肃清间谍,政府赋予特务机关太大的权力,造成太多的冤狱和悲剧,而主其事者为邀功及获奖,常不择手段地与人于罪。我是一个较幸运的人,虽蒙受两次冤狱,丧失自由近600天,但总算平安地归来。”

三、越南史研究的学术权威和中国通史专家

吕士朋有幸平安回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研究。政治的压抑挡不住吕士朋研究学问的执著。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短短的三年里,吕士朋发表了《西领时期菲律宾华侨的商业活动》、《南洋华侨乡土特质之研究》、《明代建都问题》数篇颇有分量的长篇文章,积累了大量华侨史和越南史的资料。吕士朋的勤奋和扎实根底,被近代史所一位兼职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教授看上,他诚恳地邀请吕士朋到东海大学做讲师。吕士

朋这样来到东海大学，边教书边做研究又是三年。吕士朋接连发表了《清代华侨政策演变的经过》、《菲律宾华侨地位的回顾与前瞻》以及数篇有关宋朝和清朝与越南关系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61年吕士朋被邀请以访问学人的身份，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进修。哈佛燕京不提供学位，但待遇和地位都比研究生高，吕士朋在哈佛期间完成了他第一本专著《北属时期的越南》，196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哈佛进修时，哥伦比亚等大学都想留下吕士朋去修博士学位，但吕士朋与东海大学签过约，还是如期回到台湾，很快升了副教授，1967年39岁时升为教授。吕士朋沿着中越关系史的方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和越南关系史的论著。如：《宋代之中越关系》、《元代之中越关系》、《明代之中越关系》、《明成祖征伐安南始末考》、《明代制度文化对越南黎朝的影响》、《清代康雍乾三朝之中越关系》、《盛清时期的中越经济关系》、《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越南华侨对辛亥革命之贡献》、《中国文化与越南文化》、《二千年来华人对越南开发的贡献》，在海内外产生了比较深远影响。吕士朋做中越关系历史研究的同时，越南一直在打仗，北越和南越，越南和美国军队打得很厉害，越南一直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吕士朋跨越时空和政治理念，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越南问题，既体现了吕士朋做学问的“古”与“今”结合的学风，也突出了他“修”与“悟”结合的非凡学识，从而在东南亚和欧美学术界奠基了他越南史学术权威的地位，被国际名流学会斐陶斐荣誉学会吸收为会员，在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和“美国名人录”同时列名，英国“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大辞典”同时列名。在台湾，吕士朋成为“教育部”表彰的教学优良教授，他的著作被“教育部”颁发著作特殊优良奖。

四、不是基督徒的教会大学文学院院长

吕士朋当时是东海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学问受到赞誉，他年轻时磨砺的组织能力也受到

新的重视。1972年随着美国联合董事会给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少，东海大学决定扩大招生，开创夜间部，这个任务“历史性的”落在了吕士朋的身上。吕士朋担任夜间部主任9年，大胆推进了两项改革，一是开办形形色色的进修班，二是开办“东海企业讲座”，使东海大学在职教育品牌形象树立起来。夜间部学生在9年当中从138人扩大到2200多人，尚不包括各种进修班的学员。无疑这些都为东海大学“创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台湾推广在职教育开拓了一条路子。

治学是吕士朋的生命。夜间部的成功促使吕士朋坚辞行政职务，理由是“功成身退”。1981年他重新回到东海大学历史系。可校方抓住吕士朋的组织才能不放，又安排他任历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在系所工作6年中，吕士朋开的课很广，有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经济史、西洋近代史、东南亚各国史、中国外交史等；他集中整理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出版了《民国史二十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专著。吕士朋治学的深入、独到，使他的每一部论著和论文都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

“青山入眼不干禄，白发满头犹著书”，1987年吕士朋辞去系所职务，利用休假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分别以客座研究员和访问学人身份，作进修研究。休假一年后刚满，东海大学坚请吕士朋出任文学院院长。东海大学文学院下辖六个系、四个研究所、四个附属单位，机构庞大，环境优美，享有盛名。吕士朋没有任何背景，既非基督徒，亦非东海校友，也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出任东海大学这所世界著名的教会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台湾乃至海外华界都是一个特例，自然也是东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成功。吕士朋的学术造诣使他对文学院的领导工作也得心应手，在师资提升、课程改进、与建教合作等方面迅速与世界接轨，同时个人治学领域成绩斐然，先后推出《明清史》、《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中越关系史》、《东南亚各国史》、《华侨史》一系列专著及有关论文，约40余种。吕士朋总结其经验，“做学问不拘于小范围，因为历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相关性很大，在博与约之间要恰有分寸。”这个“恰”字，学问的深厚和造诣就显露出来

了。

1996年吕士朋从东海大学退休，现和夫人定居在加拿大。可他常年仍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从1990年以后，他13次来大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私人访问，身兼大陆和台湾多种学术职务。吕士朋是台湾中国明史研究学会创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监事、中国近代史学会监事、大陆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他热衷于呼吁海峡两岸和平谈判，共谋国家的统一。多年来吕士朋在台湾作了多场两岸关系演讲，并提出过相关学术论文。谈古论今，批判“台独”；在大陆，吕士朋宣传由和平、交流、相互谅解，逐步走向统一的言论也受到学界空前欢迎。

近年来，吕士朋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颇有独到的研究。他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的论文从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1784年前来广州贸易为序幕，一步步揭示近代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与列强的异同，以及美国现行台湾政策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本国利益决定性。吕士朋提出：“美国自1899年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以推展或维护此一政策作为对华关系的主轴。时至今日，克林顿对中共所采的接触、深入、和平演变的外交策略，其精神仍源自此一传统政策。”关于美国对台湾的关

系，吕士朋的分析更为深透：“自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美国协防台湾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由于美国对台湾有此历史渊源，故在台湾能以享有重大利益，包括道德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牵制中共的战略利益。今后除非中共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赶上美国，美国会考虑撤出台湾，否则一二十年内，美国将不会放弃此一攸关亚太和平安全的战略岛屿。为此美国在两岸关系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对两岸的应付手法，极为谨慎小心，‘台湾不独立’、‘大陆不用武’，殆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重要指标。”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由交往变为僵持，吕士朋认为主要是1995年6月李登辉应美国康乃尔大学之邀访美发表公开演讲，内容有带领台湾走向分裂的趋势。1998年北京第二次辜汪会谈后，李登辉反而在1999年7月9日对德国《明星报》记者发表“两国论”。为打开目前两岸僵局，执政的陈水扁和民进党，宜调整其意识形态，主动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是历史趋势，其过程不是靠武力解决，而要靠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共同活力，靠历史文化血统的同宗同源同一性，来推进和平，迈向统一。”

吕士朋先生是个大学者，也是一个以学论道的当今奇才。（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上接50页）命的敌人在绝望中猖狂了，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在打退敌人的这次进攻中，董继民又一次负伤了，但他仍坚持着不倒下去。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一定要坚持住。六连，铁打的六连，打过多少硬仗，啃过多少硬骨头，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的记录，这一次，也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的到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满身鲜血的站起来，坚持着指挥战斗，拚命地向敌人射击。第三次负伤，董继民已生命垂危。英雄的血还能流多久！他最终还是倒下了。这时候，二营副营长张治玲同志及时率后续部队赶到（张后来也在此次战斗中负伤）。处于弥留中的董继民竟又奇迹般地睁开眼睛，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向张营长汇报了战况及敌人兵力的部署情况，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由于董继民所率领连队的英勇作

战拖住了敌人，给我军赢得了时间，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下午四点多钟，独立团大部队赶到，从西、南两面包围了敌人。下午五时许，我华野五师在师长姚运良的率领下从宿迁赶到，于黄昏前把敌人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此时的孙良诚可谓是插翅难逃。这样相持到夜里11点多钟，孙良诚亲自乘汽车到五师师部，要求起义，被我军断然拒绝。1948年11月13日夜11点40分，孙良诚率一〇七军军部及一个师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在这里，谈一下孙良诚最后的结局。孙良诚投诚后，我军当即释放了他，并劝他切勿去南京蒋介石处。孙良诚不听劝告，于翌日回到南京，几天后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责任编辑 王海印）

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

● 潘旭澜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须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埭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入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贖”。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

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玕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癒,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

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

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它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它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玕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玕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

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竟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

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谔。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谔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缢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玕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当洪秀全让洪仁玕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他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

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玕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玕为干王。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坐,就是小王的合写。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坐,已难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败。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

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游览，他照例作歪诗一首：“拉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放火烧了，结果连洪秀全尸首也无法寻找。当然，湘军纵火焚烧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这不过是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其它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对于图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杨秀清不赞成这种疯狂行为，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洪秀全没办法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败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人，前已说过，均视为“妖人”，杀之唯恐不尽。

即使早先参加太平军的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权力斗争中，多受歧视、凌辱、打击，除一两个“不知所终”——可能是逃离的，结局都很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意，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叫参加考试者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责任编辑 萧 徐）